

目 錄

- 上海私营机織工業合并合营后的新气象 習 平 3
- 上海私营卷烟工業实行了全行業公私合营 解 宵 7
- 把分散落后的毛紡織厂改造成爲全能厂 程 慶 11
- 上海“三筆”專業公司 洪 軍 16
- 事实教育了私方代表 新華社記者 22
- 第一張定貨單 季 音 26
- 上海第一个公私合营商店的誕生 季 音 30
- 花色品种增多了 沈文英 34
- 公私合营解除了“同行是冤家”的旧疙瘩 新華社記者 38
- 敲碎了丑惡的招牌 叶世濤 39
- 攤商組織起來了 沈文英 4
- *
- “傳家宝” 季 音 46
- 掌握命运 范榮康 49
- 訪上海資本家榮毅仁 徐中尼 55
- 我一定要赶上新社会 “天津日报”記者 60
- 找到了光明的道路 顏耀秋 62
- 感触最深的几件事 徐中尼 64
- 社会主义是最可靠的“保險” 陸泉源 69
- 一个双目失明的資本家当了副厂长 單子越 72
- 一个資產階級家庭的变化 賀富明 75
- 我是怎样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的 牟 蔚 77
- 我感到真正的幸福 高 潔 81

... ..

上海私营机鍛工業合并 合营后的新气象

習 平

1955年6月22日，上海市私营于义昌、王長記、順泰、胡香記等四家小型鍛鉄工厂，采取合并并实行公私合营的方式組成了“公私合营上海机器鍛鉄厂”，把上海的私营机鍛工業納入了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軌道。

机器鍛鉄是机器工業生產中很重要的一个組成部分。它的任务就是用气錘鍛打各式各样的五金零件，例如柴油机上的弯地軸，輪船上的水关，火車上的当柱，工作母机上的直地軸。机鍛工業生產过程虽然很簡單，技術要求却很高。机器鍛鉄工業是随着机器生產發展起來的，同許多厂的协作关系很大。解放前我國机器工業主要是裝配性的工業，因此依附机器工業的鍛鉄業也就十分落后。解放前，我國近代工業最集中的上海只有四家小型机器鍛鉄工厂。

解放后我國机械工業走上了独立發展的道路，各地地方國营的机械工業也發展起來了，鍛件需要量日益增加，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的机器工厂，都紛紛到上海來要求这些工厂鍛打各种零件，上海也有些机械工厂需要这四家小厂协作。但是上海私营机鍛工業，由于資本主义所有制的束縛，旧有基礎的分散落后，生產中的潜力不能發揮。这个矛盾在設備利用上就表現得很突出。这几个小型厂由于分散經營，設備分布不平衡，結果發生“小零件用大机器鍛、大零件用小机器鍛”的不合理現象，既影

响設備利用率提高，也影响產品的質量。如私营王長記鍛鐵工厂有气錘兩只：一只是 1,250 公斤的，一只是 1,000 公斤的，于义昌只有一只 1,000 公斤的蒸气錘，胡香記只有一只 500 公斤的空气錘。而鍛件規格是多种多样的，大的有四、五百斤重，小的只有一、二斤重。有时候王長記的 1,250 公斤的大气錘，却鍛打一公斤重的小零件，浪費太大。胡香記的 500 公斤气錘則鍛打 400 斤重的地軸，机器做不动，影响設備使用寿命，做出來的產品不能完全合格。1954 年 12 月份私营順泰鍛鐵工厂就因为技術和設備关系，使五十多根地軸返工退修了二十多根。技術力量分布不平衡，也產生了許多浪費，生產不能提高。如私营于义昌鍛鐵工厂只有一只 1,000 公斤的气錘，却拥有 26 个工人，而王長記有兩只大气錘，却只有 29 个生產工人，于义昌鍛鐵工厂常常是人等机器，王長記則是机器等人，兩個厂虽然只隔一道牆，但是这种不合理的現象过去不可能得到解决。

資本主义的經營思想，也經常同國家要求發生尖銳的矛盾。这几个厂由于解放后加工任务多了，資本家經常只願接受品种簡單和利潤較高的加工任务，不願國家的要求。当治淮工程緊張的时候，上海許多工厂要求这四家鍛鐵工厂协作共同完成支援治淮的机器設備，但是資本家为了追求高額利潤，竟拒絕了这些重要任务，而去做自由市場的生意。

以上情况說明，必須对这些企業進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这个問題随着生產的發展，一天比一天明顯了。但是怎样進行企業的徹底改造呢？这里發生了原則性的分歧。一种是資本主义的改造方法。这些工厂的資本家希望不改变所有制，僅僅用大并小的办法來改造企業。于义昌和胡香記在这个行業中技術是較好的，他們企圖通过改造的机会，不但保持原來的企業，并且可以得到擴大，在合并合营以前，以胡香記为首，

联合于义昌、順泰等三个厂，曾打算首先实行合并。但是这个办法結果却行不通。因为資本家之間誰也不願意吃虧，誰也不願把自己的厂拆散，合并到其他厂里去。这时候，國家提出了另一种按社会主义原則，实行整个行業合并合营的办法，把四个厂合并成一个厂，并且把企業改造成为國家資本主义高級形式，即公私合营。这个办法充分照顧了各方面的利益。它可以根本改变目前企業生產的分散落后狀況，使各厂原有的設備和技術力量得到合理的使用，生產潛力得到發揮，滿足國家的需要。采取这个办法，也可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積極性。也可以更有效地改造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使他們在劳动實踐中逐步地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办法提出后，馬上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个办法也得到了資產階級中先進分子的拥护。大家一致同意后，經過兩個月的筹备，机鍛業的四个小厂終於实行整个行業合并合营了。

四个机鍛厂在实行合并合营过程中，曾經处理了許多复雜的問題。在清產定股中的一个复雜問題是“家厂不分”。过去資本家都住在厂里，資本家的私人生活資料和工厂的生產資料混淆不清。資本家和他們的家屬都願意在清產定股中把生活資料算到厂里去，有的資本家則企圖在清產定股中把一些原來在厂里使用的財產搬到家里去。公股代表就通过資本家向其家屬說明：合营主要是生產資料，資本家用的生活資料，还是归資本家自用。同时对資本家交代清產定股必須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对行为不好的資本家作了適當的批評，对工人中的某些过火情緒也進行了說服教育。在清產定股过程中，他們还特別注意了團結依靠老工人，因为老工人最熟悉工厂和資本家的情况。

机鍛厂在合并工作中把建立机构和安排人事結合起來，先引導大家研究如何建立合理的生產管理機構，資方在討論機構

時希望機構龐大，提出廠長下邊要設三個處五個科，目的是大家都可以做領導人，這顯然是不符合企業要求的，討論後決定取消處一級機構。確定機構為安排人事創造了條件，經過充分協商，交代政策，最後資本家都按照各人的條件得到了滿意的崗位，兩個擔任副廠長，兩個擔任科長，其餘的參加科室具體工作，大家都有實際工作可幹。

上海私營機鍛業經過這次改造後，雖然時間還很短，但是已初步表現了它的優越性。工廠管理已經由分散變成集中，人力物力得到合理的使用。于義昌和王長記合併後，把廠拆除了，改成為總廠。胡香記、順泰相隔較遠，目前的廠房還可以利用，就分別成立了工場。原來技術設備和勞動力不平衡的現象，也改變了。根據實際需要，將胡香記和于義昌兩家的多餘勞動力調到了勞動力不足的王長記和順泰。過去這些小廠，也沒有什麼職能科室，生產管理很落後，現在把各廠的職員集中起來，分別組織了工務、財務、總務科，同時還從工人中提拔了四個有威信的工人充實到科室中去，科室集中辦公，統一管理全廠生產、財務和人事。統一的管理機構建立後，就大大加強了對生產的科學管理，現在，由總管理處統一接受生產任務，由工務科根據各車間設備和人力情況，把工作物品種集中分類，分配到各車間去，統一合理安排生產，小機器做輕便的工作，大的做重活。由於實行了生產品種的專一，也便于工人鑽研技術，熟練鍛制方法。

上海機鍛廠在合併合營後幾個月來，產量比私營時期提高了17.55%。產品質量也有顯著的改善，廢品率在私營時期是1.5%，合營後到10月份已下降到0.5%。由於生產的合理安排，生產成本也降低了12.07%，工繳費也相應地下降了。合併合營後，工人的集體福利和勞動條件也開始有了改善，在王長記車間，多少年來威脅着工人安全的吊車，現在正在翻修。夏季在

120 度的高溫車間裝了通風設備，工人有了自己的小型俱樂部，以及寬敞的食堂。

(1955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報”)

上海私營卷煙工業實行了 全行業公私合營

解 膏

1955 年 10 月，上海市 16 家私營卷煙廠都實行了公私合營。從此，上海市卷煙業中的私營廠都納入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

這 16 家廠，共有職工 9,608 人，資本家 72 人。1954 年的總產值是 11,480 萬元，占上海卷煙總產值的 41%。這次除了五個廠是單獨合營的以外，有 11 個廠是合併合營的，共合併合營成三個大廠。這 11 個廠規模的大小很懸殊，華美煙廠是一個規模較大的廠，有 1,473 人，光卷煙車就有 20 部；友利煙廠只有 48 人，一部機器。技術設備的好壞，各廠相差也很遠。有些廠的機器又舊又不齊全，是半手工操作的。例如瑞倫煙廠有六部卷煙機，其中三部機件殘缺不全，另外三部已用了三十多年，超過了使用年限。有的廠連水汀都沒有，烘煙絲用火烘，沒有蒸氣烘的設備，因此，碎斷的煙絲多。有些廠的廠房很小或很破舊。有的是違章建築，有的是弄堂房子，擱樓上搭擱樓，幾部機器擠在一間小房子里，工人轉動時，稍不小心，就會碰上機器輾傷。有些廠連窗子都沒有，白天也開着電燈工作。夏天，工人像悶在箱子里一樣。有的廠牆壁已經歪斜，人在樓上走，就覺得房子在動。而且鍋爐和車間聯在一起，一旦鍋爐發生毛病，全廠工人的生命都

有危險。

因为設備差，在生產上造成的浪費很大，質量也很差。例如有些厂沒有蒸叶机，只好把要蒸的烟叶堆在一間小房子里，把蒸气通進去，而房子又是漏气的，因此很难蒸得干湿正好。有时蒸得太湿了，烟叶就会發霉，蒸得太干了，烟叶發脆，容易碎。因为机器破旧不全，生產出來的烟支也很不符合标准，往往不是太長就是太短，不是太粗就是太細，不是太輕就是太重。有的厂扯叶車間八面通風，碎叶吹得滿地都是。裕華烟厂因为爐子不好，每箱烟竟要用煤 28 公斤（一般厂每箱烟只用 10 公斤左右）。

有一些厂不但設備差，而且連流动資金都沒有，靠借債度日。金蕾烟厂因为沒錢，机器上的零件坏了，从來不添新的，只到旧貨攤上去弄些旧零件來。有时弄來的零件太小了，就把机器鏟掉一些裝上去。但有一些大厂却資金十分充足，有的还因資金过多用不了而存在銀行里。这些厂設備齐全，机器是新式的，厂房新而寬敞。像華美烟厂，还有新机器空着不生產，厂房和設備原來可供一千多人开日夜兩班用，但現在是一班也沒有开足。大东烟厂的厂房只用了三分之一，由于設備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也造成了生產上的浪費，三百多人生產，用的是可供一千多人生產的大爐子。

从上面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出，有些厂是沒有条件单独合營的，連繼續生產下去都很难。因此就采取大厂帶小厂的办法，实行合并合營。这样，厂与厂之間就可以取長补短，把糟粕去掉，把多余的資金和擱着沒用处的好的設備利用起來，發揮更大的作用。不要花錢增添什么，就可以搞成三个設備比較完備的大的合營烟厂。

8 月 11 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宣布了批准合營的工厂。准备合并合營的 11 个烟厂，立即筹备進行清產估价工作。这时，

資本家最担心的是自己要吃虧。公方代表就把“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清估原則，向資本家解釋清楚。資本家嘴里說相信國家的政策，但心里还是有怀疑。有些資本家和公方代表講話时試探口气，探不出什么，又到工人那里去試探。有些資本家甚至故意把机器的价錢估低一些，或是把好机器說成是坏机器，看公方代表是否真是实事求是。及至他們親眼看見了公方代表和工人在清点估价时，做得公平合理，而且有事就同他們協商解決，原來怕吃虧的思想才慢慢消除了。公方代表一面依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則，对每样东西，該估多少錢的，就估多少錢，資本家估高了，就向他提出，同他協商解決；資本家故意低估的，也向他指出估低了，并照实际价值作价。另一方面又依靠工人、職員，向資本家說清道理。如國華烟厂有一部卷烟車，明明只可再用五年，資本家却要估八年到十年。于是公方代表就發动工人，把机器拆开来，把机件上的毛病，一样样地仔細指給資本家看。事实擺在面前，資本家就心服了。金蕾烟厂的資本家把什么东西的价錢都估得特別高，别的資本家都有意見，但是他們也想把自己的东西估得高些，所以意見都放在肚皮里。公方代表就在五个要合并在一起的厂里，組織了一部分工人、技術人員，成立一个評比組，來統一評定五个厂的机器。于是資本家就把自己原來估得過高的数字自动減低了。

公方代表在处理清產估价中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时，也是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則來办事。像大运隆烟厂有一部卷烟机，实际只能算坏机器，可是資本家要算作好机器。別厂的資本家也覺得不該算作好机器。于是公方代表就請别的資本家來評，資本家陈繼群說：“这車子，实实在在說是不好用了。”大运隆的資本家也就沒話講了。

在人事安排問題上，因为資本家各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开

始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顧慮。那些大厂的或是原在同業中有些地位的資本家，对自己今后的工作不担心，表現得很積極，但常瞧不起中小資本家。有些小厂資本家担心在合并后，地位要低了，收入要减少了。有些年紀老或是沒有文化，工作能力差的資本家，怕合并后沒有工作做，沒有收入。“倒挂”（負債超过資產）厂的資本家，想趁此机会丢掉爛攤子，心里暗暗高兴，但又怕不給他安排职位，心里又担憂。

針對这些思想，公方代表就向資本家說明我們安排人事的原則是量才錄用，只要是守法的資本家，都可有职有权，但必須要盡責守职。在处理这个問題时，根据量才錄用的原則，反复同資本家协商，像瑞倫烟厂的資本家王維林，不識字，工作能力差，但有一些生產技術。厂里准备叫他做技術顧問，但他自己提出來要当副厂長。于是公方代表就向他說明，合营后的副厂長和私营时的副厂長不同，以后在分工时，副厂長要独当一面，既要計劃、布置工作，又要檢查、总结、彙报工作。如果工作做不來，对工厂、对自己都不利。同时又向他說明技術顧問地位也不低，工作也很有价值。王維林一听，就覺得以后的副厂長，自己确是当不了，弄不好不是玩的，因此就同意了做技術顧問。

上海私营卷烟厂采取“大厂帶小厂”的办法实行合营后，已可以看出有許多好处。許多小厂过去因为設備差，管理落后，生產上就長期处于產品質量不好，成本高等嚴重局面。并入大厂后，利用了大厂先進的設備，这些因技術設備而引起的問題，就得到了解决。如裕華烟厂，过去因为鍋爐不好，每箱烟要用煤二十八公斤多，現在，利用了華美烟厂的好鍋爐，每箱烟只用煤七公斤多。并到大东烟厂去的一些小厂，原來烘絲机上的筒又短又小，烟絲挤在筒里攪不匀，結果往往有的烟絲已烘焦了，有的还是濕濕的。現在用大东烟厂的烘絲机，机上的筒又大又長，烟

絲在里头攪得均匀,烘出來的烟絲干湿正好,也不会烘焦了。專賣公司規定每箱烟用烟叶 107 斤。但在合并合营前,有些小厂总是要用 110 斤,甚至到 112 斤。現在合并后的厂已經能达到專賣公司規定的标准了,而且烟的質量也比过去高。僅合并合营的華美烟厂,一个月就能節約一万七千多斤烟叶。工人的技術特長也得到了發揮的机会,克服了劳动力的浪费。原來裕華烟厂有一个工人,修机器又快又好,但因为厂里机器少,整天沒有多少事幹。現在,他工作的勁头十足。这些并進大厂的小厂,过去福利設備很少,現在他們利用大厂的原有福利設備,劳动条件和物質生活也都得到了改善。例如,过去有些小厂沒有取暖設備,包裝車間里西北風从牆縫里鑽進來,工人冷得手指發僵,并進大厂后,走進包裝車間,却像春天一样温暖。

(1955 年 11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把分散落后的毛紡織厂改造成為全能厂

程 磨

上海毛紡工業的生產設備,約占全國毛紡工業生產設備的 70%,共有 60 个厂,其中私营厂有 53 个,產品有精紡織品、粗紡織品、絨綫、長毛絨、工業用呢、工業用氈等。这些產品不但國內需要,而且还向苏联及人民民主國家大量輸出,換回國家建設的工業器材。

在 53 家私营工厂中,大部分是單紡、單織或單染整的非全能厂,机器陈旧、設備簡陋,生產工序極不平衡。这些厂的生產,要依靠私私之間連續加工,而私私之間生產不能協調,加工產品

往往誤期、產品質量無法保證、原料材料浪費嚴重。以駱駝絨生產為例，慎誠毛織廠所生產的駱駝絨共需八道工藝過程，而該廠僅有半台圓織機，只能做一道工藝過程，其中毛紗由大公毛紡織廠供給，織成駱駝絨后再送到華翔毛織廠去拉毛，最后還要送到天翔毛紡織廠去染整。這些廠分布在相距很遠的三個區里，往返一次約有 70 華里，造成人力物力上很大浪費。造成上海毛紡工業生產設備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期間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貨幣貶值，一些資本家看到毛織廠投資少、資金周轉快、利潤大，便把毛紡工業作為投資對象。有的根本沒有廠房，只買些毛紗委托代織；也有的掛起毛絨紡織染整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其實僅有數台織機。

1953 年實行加工訂貨后，毛紡業全業初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但由于生產設備分散落后，許多工廠機器陳舊，技術力量不足，不能生產高級產品；再加上生產關係沒有改變，經營管理腐敗，工人積極性不能發揮。如不改變這種情況，不但影響國家出口任務的完成，而且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

要改變上海私營毛紡工業的現狀，必須進行全業規劃，把分散落后、設備不平衡的工廠通過裁并，基本上都組成為全能廠，才能進一步進行對毛紡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進行全行業裁并改合的規劃，是一件十分復雜的工作。53 家私營工廠中，有八種產品不同類型的工廠，其中大廠和小廠，機器設備有先進和落后，經營情況有好有壞，有的獨資，有的合夥，有的是股份有限公司。在醞釀整個行業實行公私合營中，資本家的思想情況也很混亂。有的想單獨合營，有的要求合并合營，已轉業的想轉回本行業，跨行業的想掛鉤，停業的想揆進。因此裁并改合必須結合生產需要統一規劃、全面安排，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

在中共上海市委及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首先對資本家進行整個行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動員，同時並通過毛紡織業同業公會的骨幹分子組織工作組，展開全業的學習討論。不少資本家聽到整個行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動員報告，都大為興奮，但對企業合營結合裁并改合生產改組的意見極不一致。這一情況一開始就集中反映在大廠代表人物的同業公會工作組里。如中國毛絨廠資本家陳元欽強調自願，認為自己“獨資經營，資金多，機器好，歷史長，牌子老，銷路好”，嫌小廠“機器陳舊，資金短少，管理不善，質量不好”，怕同小廠合并不合算。他們只考慮單獨合營後，生產任務可以加多，利潤也可以增多。因此，“歡迎合營，不贊成合并”。也有人顧慮合并合營很難推動，大廠、小廠難于搭配，不如採取“大合營”的簡單辦法。還有些小廠設備不全，不能進行獨立生產，困難多，曾經有過合并合營的想法，但總覺得自己生產差，資金少，怕人家不要；又怕“大魚吃小魚”，最好選個“門當戶對”，否則不願并到大廠去。

根據以上情況，要做好合并合營工作，必須說服大廠主動帶頭，動員小廠積極爭取，而取得大廠主動是工作的主要環節。大廠生產設備比較完整，經營管理比較全面，小廠分散落后，裁并就要向大廠集中，大廠如能積極主動，小廠即可解除思想顧慮。通過組織學習，明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同時經過檢查過去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的腐朽落后的根源，認識全行業合營必須與生產改組相結合。這樣經過反復討論，暴露問題、鼓勵先進、說服落后，有些大廠資本家也批判了不從全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觀點出發，只考慮自己眼前利益的錯誤思想。在討論過程中，合營章華毛紡織廠首先表示願意并進小廠，南通毛紡織廠資本家也有過與新華、正大、大成、大光明、老恒昌等六家合并合營的打算，起了帶頭作用。在醞釀成熟後，又按照產品類型分組討論，

具体解决“合并合理、私私自愿”的搭配问题，根据行业特点及生产发展需要，协商确定了裁并改合的主要原则，按产品类型组织各厂成为全能厂。企业范围较小、设备简陋陈旧、不能单独维持生产或有并厂必要与可能的，采取“大带小，先进带落后”的办法，予以裁并；受并的厂，必须规模较大，能容纳并入人员、任务，地区邻近，以及原则上不花钱或少花钱等条件来进行合并工作。

在具体协商过程中，有些大厂资本家采取主动联系小厂的办法，使小厂乐于接受。如协新找大成，寅丰找大陆，元丰找大东、精益，中国也去找金華合并。恒丰资本家沈莱舟说服了儿子沈懋丞并进裕民。其中只有海龍资本家积极性不高，始终躲躲闪闪不主动与小厂联系，推迟了工作进展。毛纺业除有三个厂因产品特殊、采取单独合营外，其余全部采取“合并合营”方式。

在合并合营中，又根据合并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并股、并人、并任务”，如协新与大成合并等，原则上机器不拆迁，多余的设备保管，将来可组织内迁，多余的厂房可以利用，作为职工宿舍或仓库等。第二种是“并股不并厂”与“合理组织生产”结合起来，如緯綸、民和兩織厂与唯一紡厂、五昌染整厂加以联并，成为三个单位，保持原址生产，联成一个全能厂。又如匯通、大光明、老恒昌、維新、大上海五厂并为两个单位，联成一个全能厂。其中大上海厂全部机器拆迁，也只花了约五百元。在经济类型上除采取私私合并外，又采取了两种办法：第一种私营厂并入合营厂。第二种合营厂并入私营厂，使经营管理专业化。

并股并入并任务是合并合营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情，要使分散全市的几十个厂几千个职工分别迁移组合，要不影响生产，又要不多花钱，必须在公方领导，私方负责，大厂主动，小厂配合下，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以合并合营单位制定并厂工作计划,做好思想动员,统一布置生产任务,解决私私财务问题,妥善安排职工生活福利及工作岗位。为了保证对生产有利,合并人员要先并生产工人后并职员,机匠组长要到受并厂试行校車,熟悉情况,然后带领工人按部就班上車生产。凡是这样做的厂,都能保证了情绪稳定、生产不乱。在此同时进行了清产定股工作,对各项人事也作了适当的安排。

经过全業规划、合并合营后,就把 53 个私营毛纺织厂基本上合并为具有纺、織、染全能生产设备的 19 个厂。

企业合营后,经过经济和技术的改组,在各方面已显示出优越性。如设备陈旧、产量低的茂新、恒丰厂和设备好、产量高的裕民、安乐厂在合并前一个月生产 10 万市斤絨綫,需开絨綫錠 2,668 枚,并入裕民厂后只需开絨綫錠 1,800 枚即可完成任务。裕民毛纺厂染部合并后,增加了技术人员,目前已初步试染了多种混纺絨綫颜色。今年三季度私营厂的呢絨正品率只有 50% 到 60%, 10 月份合并后呢絨的正品率就升到 96.89%。在经营管理上,也克服了过去分散落后、往返加工的不合理现象。如天翔等七个骆驼絨厂经过合并后,基本上可以自纺、自織、自染,节省了管理费用,降低了成本。特别是企业性质改变以后,工人的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寅丰毛纺厂精纺部工人,原来每人只看两百只錠子,10 月间去国营第二、第三毛纺厂参观,学习了清洁工作和巡回工作法以后,主动要求向国营毛纺厂工人学习,每人再增加二百只錠子,行政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有的人又主动增加了看錠的数量。元丰毛纺织厂織机部工人,原来一人看一台織机,现在一人可以看两台。合并生产以后,房子有了剩余,不但車間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宿舍有了增加,许多厂还准备設立工人游藝室或工人俱乐部,职工福利也得到了改善。

合并合营后，资本家在公方代表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下，生产积极性也有提高。如裕民毛纺厂有的资本家过去不常到厂，现在天天到厂，并且建议按时上下班。精益毛纺厂资本家徐欽瑜并到元丰毛纺织厂后，还参加了布置生产计划会议，表示要改造自己。

53个私营厂，虽已合并合营，但这些厂的经营管理亟待改进，企业的资本家及代理人，还须要改进。为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贯彻双重改造，已在合并合营基础上，成立了国营上海毛麻纺织公司来领导这些工厂，这对于今后统一布置生产任务，统一调配劳动力，组织技术力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逐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准备了有利条件。

(1955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上海“三笔”专业公司

洪 军

1955年3月，上海市第一轻工业局设立了一个制笔公司，把全市四百多个各种经济类型的金笔、钢笔、铅笔(以下简称“三笔”)工厂，从安排生产、领导生产、指导技术，一直到经济改组和社会主义改造，全部管了起来。它既要负责把整个行业从分散落后、技术低劣的水平，提高到集中、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水平；又要把整个行业从几种经济类型并存的状况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公司既是一个经济机关，又是一个政治机关。它所管的企业虽然目前绝大部分都是私营厂，工作人员中也包括若干工商界人士，但是它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專業性企業的管理機構。

我國制造“三筆”的工業企業，絕大部分集中在上海。1954年，上海“三筆”的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比重，金筆為80.2%，鋼筆為86.34%，鉛筆為52.63%。上海“三筆”行業是解放以後發展起來的。解放後，隨着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事業的發展，金筆、鋼筆曾一度供不應求，而“三筆”工業的設備簡單，建廠所用資金不多，利潤又高，加上國家過去沒有對“三筆”行業進行嚴格的管理，以致“三筆”行業盲目地大量發展起來。如金筆業，在解放前僅有8家小工廠，1954年就發展到了39家，1954年的產量比1950年增加了八倍。上海剛解放的時候，只有30多家鋼筆工廠，1953年發展到343家。盲目發展的結果是：產過于求，質量低劣，產品大量積壓。到1954年年底，全國積壓的“三筆”數量，等于1953年9個月到15個月的產量。當時，上海金筆業因產品積壓，一般工廠開工率只達20%到30%，鋼筆的積壓更嚴重，鋼筆業大部分陷于停工和半歇業狀態。金筆、鋼筆業的困難，也影響了和金、鋼筆業協作的零件工廠。由於生產困難，企業虧損，幾千個工人的生活不能維持。因此，制筆公司成立後面臨的緊急任務，就是把全行業的生產迅速安排下來。

1955年，國家分配給上海全年的“三筆”生產任務，金筆較1954年減少了37.1%，鋼筆減少了41.04%。制筆公司根據國家分配的生產任務，對各種經濟類型工廠的生產任務的分配，作了適當的調整。在金筆業中，地方國營、公私合營、私營三種經濟類型的工廠都有困難，而私營的困難更大，根據“統籌兼顧，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視同仁”的方針，就從地方國營、公私合營工廠中抽出了一部分生產任務，來安排私營工廠的生產。這樣調整後，私營廠的生產任務平均增加了26.87%，公私合營廠和地方國營廠的生產任務平均減少了7%到8%。地方國營、公私

合营内部生产任务不均衡的现象趋于缓和，并且还有利润；私营工厂不仅可以维持生产，而且改进管理以后，还可以略有盈余。制笔公司又根据“奖励先进、照顾落后、淘汰有害”的原则，对产品质量好、受用户欢迎的工厂，不论是什么经济类型，一律多给生产任务，质量差的就少给任务。质量实在低劣无法继续生产金笔的七家工厂则动员它们转业为钢笔厂。

对于钢笔业生产的安排，就比较复杂。私营钢笔厂有 188 家（包括转业的七家金笔厂），九个工人以下的占 100 家，其中 14 家没有职工，42 家只有一至三个职工。“一盏煤油灯，两把老虎钳”，就是全部生产工具；资金也大多吃光用净。整个行业没有一个全能工厂，连技术比较先进的工厂，也要三至五个合起来才能做成一枝笔，落后厂就要 15 个至 20 个厂才能做成一枝笔。对于这些厂，如不结合统筹安排进行生产改组，技术就很难改进，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即便布置了生产任务，也难以维持下去。

在同业公会和各区工商行政部门协助之下，制笔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对于有单独生产条件的 98 家工厂先布置了生产任务，使之继续生产；对于那些虽有一些资金，但是设备简陋，没有生产条件，或者虽能生产但是不能保证质量的工厂，就动员他们同有条件的厂合并劳动力，维持生产，再看情况发展，考虑企业合并问题；对于没有资金、设备，技术条件又差，仅有少数从业人员的工厂，就淘汰其企业，设法在大厂中安插其人员，维持生活。利用这些办法淘汰了 67 家小厂，从业人员分别安插到 91 家大厂中，另有 22 家小厂合并成两家较大的厂。合并的工作非常复杂。这次只是先进行劳动力的合并，清产定股、企业合并等问题则有意留待以后处理。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迅速恢复生产。

金笔、钢笔厂的生产安排好了，零件厂就自然地带动起来

了。过去零件厂的生产是自由竞争的，产品的质量规格非常混乱，任务多少也苦乐不均。这次大体上按原来协作生产的关系，把零件厂分别同笔厂搭配了起来。同时也按照“奖励先进、照顾落后、淘汰有害”的原则，对生产任务作了部分调整。

通过以上一系列工作，行业的情况初步好转了，但是问题很多。钢笔厂的合并，只合并了人，企业本身还没有合并，劳资之间、资资之间都有矛盾。因此，制笔公司在第三季度中又搞了两个合并试点。两个合并的单位，一个由七家钢笔厂和两家零件厂组成，一个由五家零件厂组成。七家钢笔厂原来都没有制造笔尖和压塑胶（笔桿原料）的设备，现在同两家笔尖、压塑厂合并，钢笔的几个主要部分已经能够自己生产，工厂的人数也增加到一百以上。五家零件厂原来虽都生产笔尖，但是各厂只具备生产笔尖的一个工序，因而根本无法保证质量，合并后互通有无，成了一家生产笔尖的全能工厂。合并后两厂的生产和管理都有改进。现在，制笔公司已经作出了对“三笔”行业实行全行业改造的规划草案。根据这个规划草案，金笔、钢笔和零件行业将在明年度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制笔公司在进行生产安排和生产改组工作的同时，还直接管理并指导各厂的生产和技术。在第二季度进行了质量和成本的评比工作，分析了各厂先进和落后之处，明确了问题的关键，带动落后厂向先进厂看齐；召开技术性的专业会议，介绍了熔金、烘片、点铍等主要工种的先进经验，印发了有关的技术资料，会后又组织小型的各工种的技术经验交流会，进一步研究和充实这些经验；提出了有技术根据的、完全可以做到的主要原料消耗指标和出片率、回爐率，推动各厂降低成本；统一规格要求，逐步订立质量标准和技术条件，把私营钢笔厂的二百多种牌号减

縮為 17 種；除推動各廠建立檢驗制度外，還組織了全行業性的節約和質量檢查、重點檢查制度，參加檢查的有制筆公司的工作人員、各廠的職工和資方代表。進行上述各項工作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促使各廠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徹底消除由於盲目發展帶來的粗制濫造的惡果；另一方面，逐步建立統一的先進技術標準和技術資料，同進行全行業改造，小廠并大廠的工作步調取得一致。目前上海金筆、鋼筆的質量正在提高，“筆尖像小刀，寫字不出水，出水像自來水”的現象已經基本上消滅。金筆廠實行限額配料制度以後，主要原料的損耗率已經降低。

對於“三筆”行業生產安排和初步的生產改組所收到的效果，最主要的是停止了資本主義的盲目發展，也就停止了隨之而來的公私之間、勞資之間、大小之間、先進和落后之間矛盾的激烈化，使“三筆”行業的生產納入了國家的計劃軌道，為實行全行業改造打下了初步基礎。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發展的惡果是，少數人發財，多數人破產，國家損失了貴重的原料和資金，消費者花錢買不到好貨，幾千工人和成萬的家屬生活困難，公私關係、勞資關係都很緊張。統籌安排以後，行業困難的局面扭轉了，全行業的生產基本上穩定下來。停工的開了工，停薪的發了薪；特別是進行了生產改組，行業比過去整齊了。金筆業淘汰了七家以後，各廠人數都在 16 人以上；鋼筆廠合併後由 188 家工廠減為 100 家，原來許多純粹是裝配的工廠，現在能夠製造筆桿和其他零件。這樣，雖然金筆、鋼筆的產量比去年減少了 40%，但是大部分廠還能有盈餘或收支平衡。

以上事實證明，成立像制筆公司這樣的專業公司來主管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行業改造工作，優越性是極大的。

首先，專業公司的設立，可以改變過去私營工業實際上幾乎沒有人管的局面，把分散的、龐大的私營工業按行業一攬子管起

來。過去，工商行政部門往往只管工商業登記和處理違法行為；商業部門只管加工訂貨戶，而且對加工訂貨戶也只管到原料的供應和產品的銷售，不管生產；工業局則只管技術；至于人民銀行、勞動局、稅務局等，雖然都同私營廠多少有些聯繫，但都是臨時性的。因為每個行業有自己的特點，行業中的各個問題又有內在的聯繫，把這些問題分割開來，由許多部門分頭去管，自然就效果不大，管理不好。現在設立了專業公司，集工、商、行政等職權于一身，再加上各個有關部門緊密協作，就能夠把一個行業“一攬子”地管到底，從安排和領導生產、指導技術，一直管到經濟改組和社會主義改造。

其次，專業公司的組織形式，不但適合于目前對於私營工業統一行政管理的需求，而且適合于對私營工業按行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要求。過去實行公私合營，是一個一個地進行。現在大規模地進行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種方式顯然就不合適了。今後改造的規模越來越大，單位也越多越小，在實行公私合營以前，不作適當的經濟改組，就無法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因此，在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前就成立專業公司，作出全面規劃，有步驟地進行全行業改造的各項準備工作，就能加快改造的速度。

組織專業公司的第三個好處是把本行業各種經濟類型的企業統一地管理起來。各廠經濟類型雖然不同，生產和技術還是一致的，統一管理以後，就可以帶動落后的向先進的看齊，便于全面地總結推廣經驗。而且在全行業改造中，許多沒有獨立生產能力的小廠，勢將并入國營廠和老的合營廠，事先把它們一起管理起來，對將來的合併也更加有利。

從制筆公司獲得的初步成績來看，組織專業公司的優越性和必要性，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但是由於這是一件新的工作，目

前这个公司的的工作中,还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解决。

(195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事实教育了私方代表

上海市公私合营新安电机厂私方代表孙鼎,在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一年多的時間中,已經認識到只有積極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企业才能真正走上正常發展的道路,个人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当有些私营工厂的资本家問他在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的体会的时候,孙鼎說:“公私合营的好处是生产大大提高。經驗只有一条:就是誠心誠意接受改造。”

孙鼎在开办新安电机厂以前,曾任上海前華通电机厂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經理等职务共12年。他在技术方面是有經驗的。新安电机厂在1954年2月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孙鼎是私方代表,并且被委任为第一副厂长,主要負責技术和原材料供应工作。一年多以來,他在公方代表領導和职工群众的帮助下,不断地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經營管理思想,随着企业的改造一步步前进。

“开源”和“節流”

新安电机厂在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生产成本很高,工繳費超过國家規定14.4%。1954年2月,公方代表把工繳費問題提到厂务會議上討論。在討論的时候,孙鼎提出以“开源”的办法來解决这个問題,这就是要求政府提高工繳費。公方代表和大多数工作人員不同意这样做,認為要从“節流”方面來解决。他們

分析了工繳成本高的原因，指出把因逾期交貨而付出的罰款和向銀行借款所付出的利息都算進工繳成本是不合理的，并且提出很多改善經營管理、降低成本的具体措施。經過大會討論，孫鼎表示對“節流”的重要性已有了初步認識，但他還要求暫時保留“開源”的意見，給他一定時間辨別是非。

攤開兩手向國家要，還是依靠職工搞好生產、降低成本？這是有關企業經營管理的方針問題。在廠務會議以後，公方代表一方面懇切地找孫鼎談話，向他指出“開源”的錯誤在哪裡，另一方面又和職工們一起研究降低成本的具体辦法。到1954年7月，全廠工繳費就降低到接近國家規定的指標，延期交貨的情況減少，銀行貸款還清了一半，節省了利息的支出，企業開始有了盈餘。這時，是非辨明了。孫鼎感慨地說：“‘節流’和‘開源’這兩個出發點，清楚地表明了社會主義經營方針和資本主義經營方針的不同。國家幹部處理問題的時候，是以國家利益和政策為依據的；而我們私方代表處理問題的時候，出發點往往跳不出本企業甚至私方利益的小圈子。”

八年沒有發現的問題

新安電機廠在實行公私合營以前，曾經在上海南京西路最熱鬧的地段設了一塊巨幅廣告牌，上面寫着：“快慢馬達，新安首創，新安馬達，品質第一。”但是那時用貨單位對新安電機廠的主要產品變速馬達的評語是：“快慢馬達，壞得快，修得慢”；“封閉馬達，渾身發燙，開了天窗，才能勉強使用。”

新安電機廠公私合營以後，職工們作了很多努力來提高產品質量，但是馬達中的主要部件——整流子的退修情況還是很嚴重。整流子“銅排跳出”的毛病特別多，因此必須修訂整流子的技術操作規程。廠里就把領導修訂操作規程的工作交給孫鼎。

工人們知道要修訂整流子技術操作規程以後，都很關心這件事。車工吳榮甫發現鐵碗頭（整流子零件）夾住銅排，就像一頂帽子歪戴在頭上，一樣不服貼，相差有四公厘，於是去找車工衛寧成商量。衛寧成認為鐵碗頭是用來壓緊銅排的，現在却壓不緊，這大概就是銅排常常會跳出來造成整流子冒火的原因。當晚，衛寧成用紙板剪了樣子，一直研究到深夜二時，發現病根在於製造“鐵碗頭”的舊卡板“量具”不對頭，要糾正卡板的設計和計算方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天，他和工人們研究開了。有的工人贊成改卡板，有的反對。這問題提到了孫鼎面前。工人們去找他，他唯唯諾諾，只願自己翻書籍雜誌，修訂整流子操作規程。公方代表知道這件事情以後，要求孫鼎重視工人的意見，並且從技術理論上進行研究。但是，他仍然懷疑工人所發現的錯誤的卡板是偶然的現象，還是所有不同規格的卡板都是錯誤的呢？後來他們檢查了各種規格的整流子卡板，並且找老工人漫談過去如何製造卡板等問題，結果証實新安電機廠的整流子卡板，自開廠以來就存在着技術原則上的錯誤。通過這件事，孫鼎清楚地看到錯了八年無人發現的問題，在合營以後才被工人找到了。

此後，在繼續修訂整流子操作規程中，孫鼎主動徵求職工們的意見。修訂好以後，又親自向工人講解。到1954年11月，這個关系到馬達質量的關鍵問題終於全部解決，整流子退修的情況不再發生了。

一堂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課

新安電機廠公私合營以後，原材料供應工作跟不上生產發展的要求。1955年2月，全廠因原材料供應不上，經常打亂生產計劃。工人們對這件事情意見很多。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

于供应科長有着自滿的情緒，而供应科內部又鬧不團結。平日，孫鼎只找科長布置和彙報工作，沒有發現這些問題。

为了更好地依靠职工改造企業和教育改造資本家，公方代表決定召开一次全厂职工代表會議，專門討論供应科的工作，并且邀請孫鼎列席听取工人們对供应工作的批評和建議。职工代表會議又決定民主檢查供应科的工作，私方代表也參加檢查。在檢查中，供应科的職員批評了孫鼎了解工作情況的時候只找科長不找科員等不深入的工作作風，也揭露了遇事組長推科長、科長推厂長的無人負責現象。在檢查總結會上，孫鼎說：“对供应科工作的民主檢查給我上了一堂極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教育課，今后我一定依靠大家搞好供应工作。”

这以后，行政方面貫徹了生產技術准备計劃和原材料供应計劃等制度，孫鼎也开始改变了不深入的工作作風。最近，厂里接受一批新的訂貨，制造技術上發生了困难，孫鼎便主动找工程師、工人开了六次會議，訂出了克服困难的措施。

表示進一步接受改造

新安电机厂实行公私合营一年多來，企業总產值提高了43.75%，劳动生產率提高了58.66%，工繳費原來超过規定的指标，現在比規定指标还低13%。一年多來，这个厂試制成功39种新式电机，供应了許多重点建設工程。其中絕大部分是按照苏联規格來制造的。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孫鼎看到了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結合在一起对改革旧企業的作用，也体会到在公方代表領導下，自己應該如何努力改造自己。1955年以來，孫鼎不止一次地向公方代表表示：希望進一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人民工程師。

(1955年12月9日新華社新聞稿)

第一張定貨單

“人民日報”記者 季 音

在上海黃浦江邊，有一塊叫做“垃圾灘”的地方。這是一塊荒蕪的荒灘，堆滿灘上的是一片暗黃色的發霉的垃圾和泥土，上面長滿着茂密的野草，也種着一些庄稼。只有在荒灘的高處有一排房屋，這是一家已經有兩年沒有幹活的拆船公司——私營鴻昌船務鋼鐵公司。最近以來，這座荒涼的“垃圾灘”突然變得喧鬧起來，荒地上建起了一排排的廠房，日夜沸騰着各種鋼鐵的轟鳴，一艘又一艘的新船從灘邊駛進了黃浦江。原來這裡出現了一座新的造船廠。

這座新工廠叫做公私合營新建船舶修造廠，它是上海私營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新階段以後的一個產物。這座新造船廠的前身，是黃浦江邊二十多家小型船廠和其他機器廠。這些小型廠過去有的是專門修船的，有的是專門拆船的，有的雖能造些小船，但是生產條件極度困難，有的是配合造船的一些協作工廠，有的是有廠房沒有工人，有的是有資金沒有廠房。例如參加合營的新發電焊廠，全部家當就是一條小木船。過去他們駕着一只木船沿着黃浦江兜生意，每天給人家燒燒電焊，修修補補。總之，個個廠都是斷腿缺胳膊，誰也不能單獨製造出新船來。1955年下半年，上海私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全行業合營的新階段，這些小廠也實行了合併和公私合營。為了發展生產，他們把工廠集中到這片荒灘上。荒涼的“垃圾灘”頓時成了一座規模不小的船舶修造工廠的所在地。堆滿了垃圾和泥濘的灘頭

上，修起了造船廠的船塢，蓋起了高高的船棚，生氣勃勃的建設圖景代替了往日的荒蕪。

公私合營新建船舶修造廠宣布成立，就接到了國家的第一張定貨單：要他們在三個半月內造出 10 艘載貨量 550 噸的鐵駁船，送給長江航運部門。這張定貨單使全廠職工和私方代表們感到極大的振奮，因為它表明國家對公私合營企業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像這樣龐大的生產任務，過去在那些小私營船廠是無法想像的。這第一張定貨單也是國家對企業的一個嚴重考驗。這種新船他們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甚至看也沒有看到過，而現在要求的時間又是這樣急，幾乎平均 11 天就要造出一條船來。更困難的是：企業才合併合營不久，正常秩序還沒有建立，職工隊伍還沒有很好組織起來。但是為了滿足國家的要求，新建船舶修造廠公股廠長終於堅決地接受了國家的第一張定貨單。

這個新工廠第一次展開了熱烈的勞動競賽，工人們在自己的車間里第一次興奮地掛起了那激動人心的標語：“我們要跑在計劃的前面！”

這塊標語牌，最先是在工廠的第一道工序——出樣部門里出現的，工人們因為不熟悉技術，使出樣任務推遲了五天，全廠的生產任務受到了威脅。這時候，出樣部門的 12 個青年團員宣布成立突擊隊，出樣車間的工人接着也全部參加，每天自動延長工作兩小時來加速工作進度，五天的工作量很快補上了，且跑到前面去了。出樣部門的工作加速以後，其他拷沖、火工、鉚釘、起重等一系列車間的工作都得趕上去，於是其他車間的工人也紛紛組成了突擊隊，勞動競賽在全廠展開了，“我們要跑在計劃的前面”這句激動人心的標語，掛遍了全廠各個角落。黃浦江邊早就天黑了，而這裡還是一片通明；黃浦江邊天還沒有發白，這裡燈光早就亮了，全廠工人們就這樣不分日夜地猛幹，多少人變得

簡直叫人不能認識了。起重車間工人王松林，在私營工廠里是有名的調皮鬼，現在成了一個最積極的工人，他簡直像發狂似地工作着，白天幹了一天，做夜班的時候，人們又發現了他，別人下班了，他不走，在工地上轉來轉去，從地上拾起丟下的鉚釘，從江邊撈起漂着的木片，在工作最苦最髒的地方，在天氣最冷的夜班裏，一定能夠找到他；過去開會他睡覺，現在開會他的話說不完，以致別人不得不打斷他的話。

人們的思想習慣變化了，人和人的關係也變化了。過去，那些私營造船廠的老師傅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生活，決不肯把自己的技術公開地傳授給青年工人，誰就是跑攏去偷看兩眼也要被趕走。但是現在，老師傅們把自己的拿手技術全盤托出來了，他們在技術學習班上教課，在日常生產中具體指導，青年工人在幾十天時間中，就學會了過去要幾年才能學到的造船技術。青年技術隊伍迅速成長了起來，青年出樣工人任志剛、陳海泉、朱德福等人，在造第一條船的時候，還是不會出樣的小學生，到生產第二、第三條船的時候，他們已經變成能夠單獨帶了別人做活的小師傅了。

工廠的技術設備、勞動保護的狀況也迅速改變了。過去這些小船廠的船塢里是沒有工作篷的，無論是下雨落雪，或者是盛夏，工人們都在露天工作。現在在新建船廠的船塢上蓋起了高大的工作篷。許多繁重的、不安全的體力勞動，開始用機器來代替。過去私營船廠造船用的鋼板是用人工來扳眼子的，現在已經改用風鑽。過去火工車間鍛冶鋼板用的火爐是用人拉風箱送風的，現在裝上了電動送風機。過去，這些私營小船廠都是用手鉚鉚釘的，公私合營的時候，一共只有六根破舊不堪的鉚釘槍，現在已經有了數十根新鉚釘槍，“嗒嗒”的鉚釘槍聲，日夜震動着整個船塢。

为完成第一張國家定貨單而緊張工作着的人群中，也有各私营船舶修造厂的資本家。这些資本家們在公私合营新建船舶修造厂里都得到了合適的崗位，兩個担任了副厂長，其余負責科室工作，有的則直接在車間里参加劳动。他們在劳动中逐步改造自己。当出样車間組織了突击队以后，他們也都参加了突击队。担任生產計劃科負責人的庄國祥为出样車間画了船体曲綫和船的甲板部分。他們經常为各車間解决技術上的困难。这些資本家过去大都是造船行業的包工头出身，但是大部分人都懂得造船技術。現在他們这种願意逐步放弃剝削、積極改造自己的表現，得到了工人的諒解和欢迎，他們和工人的关系改善了，担任了副厂長的資本家周維安、周文忠說，想到今天这种愉快的劳动生活，工厂这种一日千里的發展，在睡夢里都笑出声來了。

在厂長室門口的黑板报上，在工厂的有綫廣播喇叭的廣播声中，这个新工厂的一切变化都用数目字表現了出來：鉚釘由过去一个人一天平均打 300 只提高到 800 只，有的达到 1,200 只；法眼工由过去一天法 800 只提高到法 2,100 只；拷冲工人由过去一天打眼 1,200 只提高到 1,900 只；出样工人由过去三个人抹兩張傍板，提高到一天抹五張；起重工过去在新船船塢上排楞头要六个人一擋，現在只要三个人……总之，生產紀錄不是在逐步提高，而是在飛躍地提高。

从1955年12月3日开始，“垃圾灘”边新修的船塢里，已經先后有五艘船下水了。每艘船的完成日期愈縮愈短，質量越來越好，成本愈降愈低，第一張國家定貨單的提前完成已經在望了。新建船厂里这些來自私营工厂的全体工人們，就是这样地用他們解放了的双手，用他們順利完成第一張定貨單的驚人成就，再一次向人們証明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資本主义的真理。

(1956年1月27日)

上海第一个公私合营商店的誕生

“人民日报”記者 季 音

1955年11月16日清晨，上海公私合营嵩山区絨綫商店在一片爆竹、鑼鼓声中开始了營業，从各区赶來了道喜的隊伍和陸續不絕的顧客們。这个設有五个門市部的絨綫商店是上海市第一个公私合营商店。这个新型商店的誕生，是上海私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事業上的一个新發展。

上海市公私合营嵩山区絨綫商店，是由嵩山区全部私营絨綫商店合并組成的。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全区的九家絨綫商店一方面实行了合并改組，同时又由过去國家資本主义的低級形式——經銷店，上升到公私合营的高級形式。通过这次改造，使这些商店既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私营商店由于落后而產生的極度困难的局面。

上海嵩山区的九家私营絨綫商店，它如同上海整个的絨綫行業一样，是在解放前上海市場虛假繁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过去因为絨綫价格高，品种簡單，利潤大，又不必具有特殊技術就可經營，十分便于資本家从事投机活动，不少投机商便把賭注擲到了這張牌上，商店一家家地盲目發展了起來。这些盲目發展起來的絨綫店，在解放后的几年中，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1953年第三季度，上海國营百貨公司完全掌握了絨綫貨源，統一了牌价，給私营絨綫店的利潤作了合理的限制，打击了投机、欺騙行为，这些企業的落后性就更加暴露無遺。一方面是过去的不正当收入丧失了，而企業中的各种不合理的龐大开支却依然

如故，結果九家私營絨綫店便处于入不敷出的虧損狀況。1954年第四季度，國家在安排、改造上海各種私營零售商的同時，也對私營絨綫商業作了安排和改造，國營公司同絨綫業全行業建立了經銷關係，把它們的經營計劃納入了國家計劃，使這些商店成了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經銷商店。經過這個初步的改造，營業情況有了些好轉，企業內部也開始起了些變化。但是這個變化是很微小的，因為經銷店畢竟是比較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它不可能解決那些在資本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產生的許多根本矛盾，因此企業的困難問題也就不可能完全解決。這些矛盾主要是：

一、實行經銷後，舊有商業網的不合理狀況同新情況不相適應。過去這些絨綫店的分布有的是為了便于投機活動，有的是以城市資產階級為主要消費對象，因此都選擇了交通便利、消息靈通的繁華要道。這九家絨綫店，全部集中在嵩山區徐家匯路以北的鬧市，其中又有五家更集中在金陵東路一條路上，而徐家匯路以南、占全區一半以上的廣大地區，却一家店也沒有。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生活已經發生了變化，徐家匯路以南已經日益擴展成為工業區，勞動人民已經成為絨綫店的主要顧客，這次公私合營絨綫店開業的第一天，第一個進來買了四斤絨綫的主顧，就是一家醫療器械廠的職工。但是不合理的商業網，卻丟掉了這批購買力很大的顧客。

二、經銷店雖然在經營上初步納入了國家計劃，但是企業的經營管理、組織機構仍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套。這九家絨綫店管理落后、人員過剩、開支浩大的情況是很嚴重的，如只有半開間店面的順利絨綫店有職工六人，同秦昌絨綫店有職工19人，即使在買賣最好的時候，也只要一半人就夠了。又如伙食的開支，最高的每人每月達27元（上海店員伙食一般一個月只要15元

左右),工資制度也很不合理。經銷的利潤收入同这种浩大的开支当然不能平衡,結果只好虧損。

三、这些低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企業,由于生產关系未能改变,职工的劳动積極性受到了束縛,又加企業經營腐敗,虧損一天天嚴重,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沒有保障。这九家絨綫店近年中几乎沒有一家不鬧勞資糾紛的。同时,因为沒有國家代表直接参加企業的領導,不但企業的改造很困难,資本家的思想改造也收效不大。

由于上述这些矛盾的存在,这九家絨綫店虽然实行了經銷,困难依然嚴重。九家有八家还是不断虧損,其中如从業人員較多的同泰昌絨綫店和規模最小的協記絨綫店,即使在營業最旺的秋冬季節,也不能达到收支平衡,有一家資金和負債額已經相等。这就是說,这九家私营企業事实上已經不可能再按照旧方式經營下去了,他們必須找一条出路。

1955年5月間,國家帮助嵩山区的棉布、百貨、煤薪炭等行業調整了零售網,有的商店進行了合并經營,營業有了好轉,这九家絨綫店便决定采用这个私私合并办法來找出路,資本家們拟出了一个機構龐大的合并方案。但是职工对私私合并情緒不高,資本家間也有矛盾(有盈余的絨綫店資方就坚决不肯参加)。因为私私合并不过只是形式上由分散經營做到了統一經營,企業性質並沒有改变,許多重大問題仍非資本家的能力所能解决,如改善經營管理、解决許多不合理的制度等,甚至对 89 个职工,也無法統一管理。資本家們也有自知之明,在推举經理人選的时候,誰都不願意來担任这个日后必有無數麻煩的职务,最后就推了一家只有五百元資金的、最小的絨綫店資方來充任这个角色。私私合并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宣告流產。这时候,國家通过嵩山区的工商联向絨綫業資本家們指出:要合理解决絨綫業的

問題，只有在合併的基礎上實行公私合營，取得國家的直接領導。國家的這個啓示，給資本家們指明了一條出路，真是人人喜出望外，他們形容當時的心情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於是九家絨綫店資方就在10月底聯名提出申請合營，並得到了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批准。

九家絨綫店在公股代表領導下，採取充分協商的辦法，順利地解決了合營中的清產核資、人事安排、機構調整等問題，並且決定今後利潤分配採取定股定息辦法。這些店過去大部分是虧累不堪，根本沒有紅利可分，實行定息辦法後，使他們有一定利潤可得，因而都表示同意。機構調整中適當地精簡了管理機構，把九戶併成五戶，重新合理調整了零售網，把集中在金陵東路上的五戶減為二戶，其餘都分布到勞動人民居住區。資方實職人員全部合理安排了工作，另外又提拔了四個職工擔任分店的正、副主任，加強了領導中的職工成分。各店的勞動力也統一作了合理分配。

在合營過程中，各有關方面對資方代表進行了誠懇的思想教育，解除他們的各種疑慮。其中有一個絨綫店過去營業較好，資方最初不肯參加公私合營。第一次請他參加座談會，他覺得同他無關，會開到中途就請假退出了。第二次座談的時候，他漸漸覺得會上所談的公私合營辦法很好，他不參加公私合營，今後也很難再維持過去的營業狀況。就一直聽到散會。第三次座談會開到一半，他就起來發言，要求參加公私合營。在這種思想教育下，好幾個資本家作了自我檢討，大家都表示今後要好好改造自己。天寶絨綫店資方檢討了過去的勞資關係，並自動拿出了現金3,000元，作為股金加入新企業。

實行公私合營在職工思想上也引起了變化。同泰昌絨綫店有兩個職工長期鬧架，已經有半年相互不說話了，在討論公私合

营工作的小組会上，兩人終于激动地相互作了檢討，表示今后一定要團結一致，做好新工作。許多职工表示今后要加强劳动紀律，改善服务态度。实行公私合营前他們成群地赶到上海第一百貨公司，去學習新的銷售方法。改变了生產关系之后，使这些职工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公私合营絨綫商店已經在11月16日正式开始營業，一星期來，每天平均營業額要比实行公私合营前增加一倍左右。

上海公私合营嵩山区絨綫商店的組成，为國家資本主义商業如何由低級形式發展到高級形式創造了一些初步的經驗，它說明了公私合营不僅是目前改造私营工業的主要形式，只要具備了一定的条件，在改造私营商業方面同样是有有效的。实行这种公私合营也应当根据“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方針，同时進行必要的合并和改組。嵩山区絨綫店的合并改組还只是在一个区的范圍內進行的。11月18日，上海全市一百多家絨綫零售店，繼嵩山区絨綫店之后，已經被批准实行全行業公私合营，这样，上海的私营絨綫零售商就可以在全市范圍內進行合理的安排，改造工作也就可以做得更深入，更合理，也一定更有成效。

(1955年12月6日)

花色品种增多了

“人民日報”記者 沈文英

在首都最繁榮的王府井大街上，有一家專門經營毛綫織品的“大同毛織商店”。这家商店的鋪面不算大，但是貨櫃里陈列的各种毛綫衣、毛綫帽子、手套、毛圍巾等，特別鮮艷、新穎、

美丽。

大同毛織商店的鄰近，有六、七家規模較大的百貨商店，還有國營百貨商店。這些商店里也備有數量不少的各种毛織品，但是為什麼大同毛織商店的商品特別美觀、新穎呢？這是因為大同毛織商店過去有一些經營的“竅門”。這“竅門”就是：隨時聽取消費者的需要，研究消費者需要的變化，根據消費者的要求，及時改變商品的式樣、花色，來迎合消費者的愛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大同毛織商店所經營的商品中，有一大部分是從上海一些技術較高的私營小手工業和機器毛衣編織工廠買來或加工定制的。有一小部分是分發給北京市技術比較高的編織工人編織的。因為商店的資金少，進貨的數量也少。對一些新式樣的毛衣只準備少數几件，並且隨時在配色上、式樣上調換花樣。有時候，他們看到國際友人身上穿着一件時新的毛衣，就把它的花樣和式樣描畫下來。有些國際友人還主動供給式樣和花樣，向他們定制。要出一種新式樣，他們常常先加工兩、三件試銷。在試銷過程中，再聽取和征求顧客對新品種的意見，然後再加工一批來賣。這樣隨時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及時改進式樣的辦法，就使商品具備了新穎、美觀的特點。這些小型手工業工廠比較零星、分散，只能採取少量加工或收購的辦法，是目前國營商業部門所難以掌握的；因為國營商業部門要掌握主要的大宗的貨源來領導和穩定市場，要對零星分散的小型手工業工廠進行零星的少量的加工，現在還有一定的困難。至於一般的私營百貨商店，因為經營的品種較多，不可能以較大的力量來研究毛衣的式樣。而大同毛織商店專門經營毛織品，就容易形成商品比較新穎美觀的經營特點。

去年9月，大同毛織商店和東單區其他八個大百貨商店一起，實行了公私合營，成了北京市百貨公司東單區百貨商店的公

私合營大同門市部。

“改造私營商業不能減少經營品種，必須保持經營的特點”，這是東單區九大戶百貨商店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北京市商業局等有關領導部門曾一再強調提出的。但是當時把主要精力放在進行合營的籌備工作上，接着又進行了清產定股、改善經營管理、確立各種手續、制度、計劃等工作，對增加經營品種和保持經營特點注意得不够，特別是對資本家的教育注意得不够。大同毛織商店的資本家在籌備公私合營的過程中是有顧慮的，開始他覺得有這家買賣坐吃也能吃幾年，不願參加合營。後來在同業公會的教育和幫助下才願意合營，但是仍然抱着觀望的態度，在合營前的一個時期內，就不願意積極進貨。同時國營公司為了統籌安排私營商業，也控制了一部分貨源的供應。再加上公私合營後企業的性質有了改變，很多商品的价格趨於合理，顧客就特別擁擠，買賣一月比一月好。特別在國慶節的時候，女同志去買花毛衣的特別多。在國慶節後不久，童綉花毛衣、帽子和毛綫等品種大大減少，女綉花毛衣也余下不多了。顧客一進門看到貨架上東西少了，就有意見，都說：怎麼大同門市部商品這樣少，賣出來的東西不如過去新穎、美觀了。

顧客們的意見，引起了有關領導部門的重視。東單區百貨商店的公方代表、副經理徐燦章，就積極主動地和資方經理馬楛如和大同門市部資方副主任張健安商量研究。先通過合營後買賣一月好一月等具體例子，打破了張健安的顧慮。通過張健安，馬上和北京市原來有加工關係的 12 家小型毛綫織廠和手工業者取得了聯繫，召集他們開了會，向他們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說明公私合營後企業的性質改變了，既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更好地為消費者服務，又要在可能和必要條件下減輕消費者的負擔。隨即同他們建立加工關係，並且及時把顧客的新要求

告訴給加工廠，指導他們改進生產技術。大同門市部公方代表王茂如又主動和資方共同商量研究，一同到東單、東四、崇文等國營百貨批發站購進了大批毛綫、毛綫衣和圍巾，以供應一般顧客的需求。為了更多地增添新穎的品種，除了在北京掌握貨源以外，北京市百貨公司還投入了一部分資金，東單區百貨商店副經理徐燦章又和資方工作人員、職工對經營特點作了反復研究。他們提出從1954年冬季以來，因為國家要統一掌握貨源，有了統一的採購制度，私營商店的貨源主要是向國營公司進貨，他們原來和上海私營小型手工業廠的聯繫就被切斷了。有些上海生產的花樣新穎的小孩綉花毛衣、大肥袖女毛衣、薄拉毛衣等就停止了加工。但是目前北京的加工力量、設備和技術水平都還趕不上。上海市的私營加工廠也有很多已經組織起來，納入國家計劃生產的軌道。因此，要增加新品種，除了指導北京工廠改進加工的技術外，還要想法和上海國營百貨採購站取得聯繫，從上海加工一部分新品種。於是，在商業部的幫助下，北京市百貨公司派人去上海聯繫，解決了貨源。從去年12月份開始，北京加工的大部分新品種源源運進，大同門市部的品種迅速從一百六、七十種增加到將近二百種。為了供應新年首都人民的需要，從12月23日到31日，先後運進了一千三百多件毛綫衣、七百來磅毛綫。在這些毛衣中，有帶穗的女花毛衣、女翻領雙色花外衣、男式綉圖案花外衣、小孩拉毛圍巾等十多種新品種，毛綫的種類也有增加。12月份的營業額比合營前的8月份增加了82.7%，比11月份增加了8.1%，很多顧客都感到大同門市部的商品比合營前花樣更多了。1956年1月份開始，從上海小型加工廠加工和收購的新品種也源源運進，很受顧客的歡迎。

為了保持經營的特點，現在大同門市部每五天向區商店填一次要貨單，及時添進商品。區百貨商店還派一個業務員住在

上海，經常和上海百貨采購站、上海市百貨公司取得密切聯系，及時反映首都人民的需要，提出改進產品的具體意見，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現在，大同門市部的顧客盈門。它的供應對象中除了一部分國際友人外，大部分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顧客們常常抱着一包包的毛衣或成捆的毛絨，滿意地走出大同門市部。很多顧客都這樣說：大同門市部的東西品種多、價錢比過去合理，這真是公私合營的優越性。

(1956年2月4日)

公私合營解除了“同行是冤家”的旧疙瘩

合肥市鴻興公、萬豐、李輔記三家私營百貨商店在公私合營後，解除了“同行是冤家”的旧疙瘩。

這三家緊鄰的商店都在合肥市的宿州路上，1月14日它們同時被批准公私合營。當天晚上，這三家商店的資方和店員就把三家商店的隔牆打通。顧客到萬豐商店買漆殼熱水瓶，店裏沒有，店員便把顧客介紹到鴻興公櫃檯去買。鴻興公商店沒有電石，資本家和店員便和藹地對顧客說，到李輔記櫃檯就可買到。

這幾天，它們的生意特別興隆。同時，要抽出人來進行公私合營工作，於是這三家商店便相互支援。鴻興公商店的資本家文化水平低，不能開發票，萬豐商店的資本家便主動地幫助他開發票；當萬豐、李輔記商店人手不足的時候，鴻興公商店就主動派人去幫助。

这三家商店的资本家过去为了争生意，互相排挤。万丰和鸿兴公商店同时进的绿宝牌香皂，万丰商店卖四角三分一块，鸿兴公商店就卖四角二分一块，两家曾为此争吵不休。有一次鸿兴公店里资金发生困难，进不了货，向万丰商店借贷，万丰商店的资本家硬是不借给。公私合营以后，这三个店的店员首先团结起来了，他们带动资方开会检讨了过去的缺点。最近这三户商店和附近的一户小商店，经主管机关批准合并为一个门市部。百货公司拨给他们八千多元的百货商品。现在每天的营业额比公私合营前增加了50%左右。

(1956年1月25日新华社新闻稿)

敲碎了丑恶的招牌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1956年1月20日，在一片欢腾声中，上海市汉口路上两家“冤家店”的老板陆德林和王益三在店门口握起手来。两店的职工放起鞭炮，庆祝企业被批准公私合营，欢迎两家资方解开结了几十多年的死疙瘩。

这两家商店都叫“文魁斋”，卖的是一式的苏州口味的糖果和“药梨膏”，店门口都有两块丑恶的招牌：一块写着“天晓得”，一块画着个大乌龟。两家是紧邻，由于互相竞争，一代两代地结下了冤仇，现在的资本家已经是第三代了。“天晓得”和“乌龟”招牌就是他们明争暗斗的标志。

最初，有一个资本家在汉口路开设了一家“文魁斋”糖果店，卖些松子糖、胡桃糖等甜食，生意很好。另一个资本家看得眼

紅，就在它隔壁租下一間店面，也開了一家糖果店，裝璜、設備和經營的糖果同“文魁齋”一模一樣，開頭名叫“文桂齋”，但是門前冷落。不久以後，這個資本家暗暗地把“桂”字改成了“魁”字，于是一條路上出現了兩家“文魁齋”，營業不分上下。

老“文魁齋”的老板（沖沖地趕到招牌店去做了）一塊“烏龜”招牌掛在門口，上面還寫着“看！看！看！烏龜眼睛太小，見人牌號就要假冒”，沒有多久，新“文魁齋”也掛出了同樣的“烏龜”招牌。老店又做了塊“天曉得”招牌，意思是誰真誰假只有天曉得。幾天後，新店門前也出現了“天曉得”招牌。這些年來，兩家的資本家都一心要擠垮自己競爭的對手。

這次上海市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的時候，兩店職工首先商量推動資方消除宿仇，一同迎接公私合營。老板們听了上海市市長陳毅的報告後，也覺得過去勾心斗角的資本主義道路不能再走了。1月16日，兩店職工、資方合起來開了個勞資座談會，兩店資本家作了自我批評。王益三與陸德林都說，上海就要成為社會主義城市了，還留着這些丑惡的招牌做什麼？1月19日一早，兩家老板卸下了積滿塵垢的舊招牌，當街一榔頭敲掉。四鄰和行人都來觀看，附近的大陸電工廠職工還放着鞭炮趕來祝賀。

1月20日上午，陸德林和王益三親手掛上公私合營新招牌，職工們也把一幅“慶祝上海市私營工商業全部申請公私合營”的紅布橫幅聯掛在兩家店門口，原來掛“烏龜”招牌的地方出現了金光閃閃的“喜”字。

（1956年1月25日新華社新聞稿）

攤商組織起來了

“人民日報”記者 沈文英

北京市東四人民市場是個攤商集中的市場。場內共有攤商935戶，包括棉布、百貨、文具、陶瓷、估衣、旧書等36個行業。從1955年4月到現在，已經有四分之一的攤商組織起來，成立了包括棉布、百貨、文具、旧書、鞋面等15個行業組成的15個聯購聯銷小組。

攤商的特点是僅有少數資金，用自己的勞動來分擔一部分社會商品流轉的任務，供應消費者的需要，這是它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方面。東四人民市場的攤商，主要是供應附近居民一些日用必需品，棉布、百貨以至鍋、碗、瓢、勺，針、線、衣、帽，樣樣都有。但是他們又是私有者，有分散、落后、保守等特點，他們的經營思想和經營作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雖然在市場建立的初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加強了管理，規定實行明碼標價售貨，但是旧的經營作風依然長期存在。少數攤商還以次貨抵好貨，用圓頭尺量布尅扣尺寸等來蒙混顧客。同時，攤商的資金有限，差不多天天要到小手工業產品的市場和國營公司去進貨，影響營業時間。而且同一行業的戶數多，各戶都要進一些一般消費者都需要的貨物，因此經營的商品彼此相差不多，花色品種極不齊全。再加上零星進貨費用大，賣價就要高，盲目競爭追求利潤的結果，就增加了消費者的負擔。東西貴、花色品種不全，顧客自然不願意買。特別是從1954年開始，國家為了更好地合理分配工業農業產品供應消費者需要，國營商業代替了私營批發商的業務，

掌握了主要商品的貨源，攤商原來在自由市場除購的商品受到限制，商品的品种就越來越少。这样使攤商的營業額逐漸下降，賠錢戶月月增加。拿棉布攤商來說，从1954年9月國家对棉布实行計劃供应以后，市場的棉布攤商就全部成为國營公司的經銷商。但是戶數多，平均每戶資金还不到六百元。除了購進一批青、藍、白、灰布外，就沒有力量購進質量高、花样新穎的布匹。大部分攤商只有二、三十种商品，顧客挑不上合適的布，買賣就一天天少了。虽然市花紗布公司供应站和东四区人民委員會商業科月月幫助他們算賬、想办法維持他們的營業，用多分給揚銷貨、不要布票的布头等办法來照顧，但是攤商本身的弱點未能克服，因而1955年第一季度里，18戶攤商中还是有15戶賠錢。

在攤商經營困難的情況下，东四区人民委員會商業科和市花紗布公司供应站的工作人員經常向攤商宣傳組織起來的好處。当时就有东四区人民代表、东四人民市場攤商聯合委員會委員李子揚、棉布攤商組組長金永年向政府提出組織聯購聯銷的要求。区人民委員會就決定先以棉布攤商为試點，組織聯購聯銷組。但是，因为各戶資金有大小、業務有好坏、家庭人口有多少，收入开支又各不相同，对联營的态度就不同。整个組織聯購聯銷的过程，是个集体主义思想和分散落后思想斗争的过程。在18戶攤商中，除了積極帶头的兩戶外，其中有11戶資金小、顧客少、經營能力差、地段又不好，營業不能維持，他們感到組織起來后有困難大家想办法解决，都積極拥护組織聯購聯銷。有四戶是資金較多、地段好、賣錢多、开支小、一般能維持經營的，顧慮就很多。攤商孙瀛洲說：“我的攤子地段好，買賣能維持，加入后垮了怎么办？如果不參加，大家都組織起來了，豈不會把我擠掉。”他左右为难，猶豫不決。也有个别戶堅決不願參加。如攤商李端然有1,500元資金，家里有一所房子，子女都有

工作，不做買賣生活也過得好，因而就堅決不願意參加，並且還到處宣傳：“十幾戶聯在一起做買賣，怎麼也搞不好……”

針對這些情況，東四區人民委員會商業科和市花紗布公司東四區供應站的工作人員，在中共東四區委員會的領導下，從組織和領導攤商討論和解決工資、資金入股股息和對困難戶的照顧和補助等問題入手，來消除各種思想顧慮。他們暫時規定在聯營後開始的三個月里，按照每人每月工資 35 元計算，三個月後再根據工作能力來進行民主評定。對資金入股計付股息的問題是資金較多戶所關心的。孫瀛洲說：“我的資金多，坐吃也夠吃三年的，加入了吃虧怎麼辦？”經大家研究，暫時採用按股金付息的辦法，每月支付一定的股息，這樣就使資金多的解除了顧慮。有的攤商家庭人口多、只靠工資或股息收入還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大家決定要給以一定的補助。為了作好補助工作，攤商組織了調查小組，調查研究各戶的生活和收支情況，經過自報開支民主評議，確定對困難戶的補助，並決定根據三個月後各戶評定工資後的收入情況，再適當變更或減免補助。另外，還規定在純收益里提出一部分作為公益金，用做對病老、死亡等意外事故的補助金。區商業科還幫助他們討論和制定了組織章程，規定具體的制度和辦法。除了堅決不願參加聯購聯銷的李端然外，其餘 17 戶棉布攤商都在 1955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聯營。

棉布聯購聯銷組的建立，給全市場的攤商指出了方向。從 1955 年 7 月份開始，百貨、文具、電料、鞋面、旧書、陶瓷等 14 個行業吸取了棉布業聯購聯銷組的經驗，先後成立了聯購聯銷籌備小組，醞釀聯營。在區商業科的領導下，着重進行了集體教育，並且通過棉布聯購聯銷組的具體事例，說明組織起來的好處。有個別攤商一面宣揚聯營後不自由，一面買皮襖、收音機、制新衣。有少數攤商表面上贊成聯營，背里造假賬、想辦法抽資金。

筹备联营小组及时地向他們進行了批評和教育。对少数不願参加联購联銷的，同意他們单独經營；对个别反抗或破坏联营的，决定在一定时期內不吸收他們入組。到9月初，就建立了15个联購联銷小组。

組織联营后短短的几个月來，已經顯示出很大的优越性，許多过去不願参加联营或暂时不被吸收入組的攤商，看到組織起來的好处，紛紛申請参加。

联購联銷后，資金可以集中起來用，能增加進貨的品种，克服过去分散經營進貨品种少的缺点。如棉布業联营后就增添了一百四十多种商品，过去沒有力量進貨的灯心絨、双面卡嘰、泡泡紗等商品，現在也能增添了。联营前攤商資金少，周轉困难，天天要跑公司、市場進貨，浪費很多運費。联营后有了業務會計組，有專人成批統一進貨。第一个月的運費就降低了83.92%。过去攤商的經營費用和家庭开支混在一起，賺多就多花、賺少就少花，賠錢就吃老本。联营后收入固定了，克服了浪費。針織、一般百貨、搪瓷三个組，9月份比8月份降低开支39.22%。許多組在联营的第一个月都有了盈餘。如棉布業3月份賠了60元，4月份全組就賺純利580元，初步改变了苦乐不均的情况。資金多了，从國營公司進貨的比重就逐步增加，逐步提高，同时又保持他們原來經營的品种花色，以適應消費者不同的需要。这样一方面使業務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便于國營公司對他們進行改造；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它們原來的經營特点。組織联营后，攤商初步改变了經營作風，一般商品都按國營公司牌价出售。國營公司沒有牌价的商品，也能適当地降低价格，使价格合理，顧客滿意。很多机关团体、市民都願意到市場來買东西。如北京市立第五医院职工一次就買了27匹棉布。

联購联銷組还建立了各种制度，主要是健全了會計制度，專

設會計建立賬目。15个联購联銷組都在市人民銀行立了賬戶。这些組还建立了上下班、請假和學習等制度，便于組織學習，从思想上進一步得到改造。

东四人民市場的15个联購联銷組，已經給全市場的攤商樹立了榜样。現在有自行車零件、新鞋、皮箱、毛衣、服裝等5个行業164戶攤商正申請联營。百貨类系統的联購联銷組正在申請合并成一個大的联購联銷組。

事实說明，在攤商集中的市場中組織攤商联購联銷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組織形式適合于目前攤商的經濟基礎和覺悟程度，对進一步对攤商進行社会主义改造創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5年12月23日)

“傳家寶”

“人民日報”記者 季 音

上海私營百達棉織廠資本家季慕卿兄弟，1955年12月在迎接企業公私合營的時候，拿出了家藏的495兩黃金，向企業投資。這件事情，得到了上海人民的讚許，表明黨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的政策，已經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季慕卿兄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鑒於物價一天數漲，偽幣不斷貶值，為了穩當地把從工人血汗勞動中榨取的錢留給后代，才買了這一大批黃金。最初，他們把黃金秘密保存在向中國銀行租用的保險箱里。後來，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宣布要以偽金圓券強制收買黃金，又風聞蔣匪經國要搜查中國銀行里的私人保險箱，才由八個兄弟分攤保管，每人60兩。

在解放以前，這個資產階級家庭因財產的逐漸增多而不安寧起來。門口經常出現嘴角叨着香煙的各種形跡可疑的人物，土匪、流氓要錢的恐嚇信接連地寄來，有時候土匪的汽車就公然停在門口，嚇得全家驚慌萬分。有一個白天，三個土匪闖進了門，用手槍逼着一家人和管錢的賬房到一間小屋裏，然後取了鑰匙，拿走了銀箱里全部的錢。季慕卿的母親急得從二層樓的窗子上跳下來，跌掉了牙齒，人也昏厥過去。那時候，季慕卿的父親不敢單獨在外邊走，因為隨時都有被“綁票”的危險。每次出門，妻子便跟着一齊出去，留在家的也就惶惶不安，到他們回來才放心。

更不幸的是，這“傳家寶”沒有給這個資產階級家庭的后代帶來什麼幸福，反而成了家庭大悲劇的禍根。第八個兄弟季海

磷，自从繼承了父親的財產以后，就成了投机商人，整天沉溺在跳舞場，酒吧間，乱搞女人，小家庭里鬧得烏烟瘴气。他不但把60兩黄金揮霍得精光，另外又花去了七千多元，背了五千多元的債，最后走投無路而自殺。

这个資產階級家庭里的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在解放后的几年來不断地發生了变化。最小的、排行第十的兄弟，跟季海磷是同母生的，同样受到母親的寵愛。但是，他是在解放以后的新社会里成長起來的，大學畢業后就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先后到了沈陽、太原等工業城市。他看到了國家社会主义建設的宏偉圖景，受到了党和國家的教育，参加了青年團，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自己的理想。他一次次地把家里寄去的錢、衣服等原封退回來，并且在信上寫道：“我不要家里的錢，我有自己的劳动收入。”他一再來信表示不要这60兩黄金，也不要厂里的股份，只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厂的股東册上抹去，以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光榮的劳动者。

在这个資產階級大家庭的第三代里，發生了更多的变化。他們有的是農業科学工作者，有的是國营工厂的技術員，有的是專門从事茶叶生產的技術幹部。那些年紀还小的，也大都参加了少年先鋒隊，帶上了紅領巾。他們热爱工作和學習，对这“傳家宝”都毫無兴趣。有一次季慕卿家里討論处理黄金的問題，他的妻子对兩個还在初級中学唸書的女兒說：

“你們將來長大了，我要給你們打金鐲子，陪嫁，怎能不要黄金呢？”

“不要！不要！我們將來自己会劳动的，不要你的金子！”兩個少先隊員回答得很干脆。

这几年來，季慕卿兄弟看到了中國共產党和工人階級移山倒海的偉大力量，知道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抗拒的。1950年

年初，季慕卿曾派了第六个兄弟季培元到香港，把解放前存在那兒的20萬元港幣兌成美金，存入美商大通銀行。當時在他的心目中，美國銀行當然是最可靠的。但結果他錯了，抗美援朝一開始，美國政府無理凍結了中國人民在美國銀行里的存款。這個資本家和美國銀行的聯繫也就從此中斷。這期間，他每天閱讀着報紙，接連不斷的勝利消息使他震驚和感動，他完全沒有想到，立國才一年多的新中國同朝鮮人民，竟然擊敗了世界上的头号帝國主義和許多帶兇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時，季慕卿和季震元兄弟都已擔任了上海區的抗美援朝支會委員，在購買飛機大炮支援人民志願軍的捐獻運動中，他們廠便捐獻了36,000元。抗美援朝的勝利使季慕卿認識到了新中國是不可戰勝的。

“三反”、“五反”運動中，季慕卿兄弟又一次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威力。在這次運動中，他們向工人交代了一些違法事實，後來被評為基本守法戶。這之後，季慕卿兄弟管理生產的責任心比過去提高了。

解放後幾年來，百達棉織廠廠房擴大了，工人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半。過去只生產內衣胚布，現在已成為全能廠。它的產品全部由國營百貨公司包銷，企業有一定的利潤可得。

這一切變化，使得“傅家寶”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愈來愈下降了。季慕卿兄弟在學習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曾經想到把“傅家寶”繼續調在家里沒什麼用，但是在談到如何處理的時候，家庭里就發生分歧。有的要繼續留着，有的要打首飾，有的只肯買公債。這個爭論，表面上是討論黃金處理，實際上是反映了兄弟和妯娌之間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前途看法還不一致，於是這件事就攔了下來。

1955年11月間，上海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季慕卿兄弟聽了毛主席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座談

会上講話的傳達，學習了各種有關文件，個個歡欣鼓舞。遠在北方工作的小弟弟也一再來信鼓勵他們爭取公私合營。於是就在1955年11月14日和19日召開了兩次家庭會議，在上海的六個兄弟、妻子、母親都來參加。會上，季慕卿和季震元向家屬們傳達了毛主席的教導，解釋了共產黨的贖買政策，資本家的前途等等。會上，大家很自然的討論起如何處理“傅家寶”的問題來了。他們回憶了家庭的歷史，特別是对比了兩個弟弟的不同道路，更認清了把剝削來的錢遺給子女，實際上不過是毒害后代。他們也談了陳毅市長在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的錄音廣播，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無限美好前途使大家感到興奮。他們認識到國家有前途，企業有前途，子女有前途，資本家只要好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逐步放棄剝削，同樣有前途，那麼還要把這剝削來的“傅家寶”留着幹什麼呢？於是大家一致決定把藏的黃金全部拿出來兌成人民幣後，投入企業，作為迎接公私合營的賀禮。有的還願意把60兩以外的黃金也拿出來。合在一起一算，共計有495兩。會上還推選季慕卿、季震元、季培元三兄弟起草，給陳毅市長寫一封信，報告這次家庭會議的結果，保證要在實際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開始新的生活。

(1956年1月8日)

掌握命運

“人民日報”記者 范榮康

義利食品公司是北京市最早出現的公私合營企業之一。這個朝不保夕的資本主義的爛攤子，公私合營的四年多來，變成了

華北區最大的一家食品工廠。

倪家璽是義利食品公司的私股代表，現在擔任副經理的職務。他的祖父是資本家，他的父親也是資本家，他自己立足于資本主義市場也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前，他創辦了大華實業社。在街頭上，報紙上，雜誌上大吹大擂地做廣告，宣傳大華實業社出產的留蘭香牙膏是“美國技師配方”，有“水果香味”，那時他迷信廣告，認為廣告決定商品的銷路，留蘭香牙膏的廣告直做到這樣的程度：整個大華實業社的營業收入還不足以支付留蘭香牙膏這一種產品的廣告費，但倪家璽滿不在乎，他覺得這正是自己目光遠大，他幻想着有一天大華實業社出產的留蘭香牙膏會同“可口可樂”齊名，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經營的企業會遍布全國。然而，還沒有等他賺回一元錢，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向上海，一顆炸彈毀滅了大華實業社，也毀滅了倪家璽最初的幻想。

抗戰爆發後，倪家璽到了國民黨統治區，他很快就發現組織運輸公司是“喇叭一响，黃金萬兩”，馬上買了兩輛大卡車跑公路，後來就4輛、8輛、20輛、40輛的發展起來，成立了聯華運輸公司。

倪家璽得意起來，覺得自己腦筋靈活、辦法多，沒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可是，聯華運輸公司的黃金時代也只是曇花一現。不久之後，官辦的中央信託局成立了運輸公司，花紗布公司也有了運輸大隊，宋子文的揚子公司也設立了運輸部，私營的運輸公司接不到貨，買不到汽油，營業範圍越來越小，偶爾裝滿了貨，一路上還有重重關卡敲榨勒索。在多方摧殘下，聯華運輸公司最後只剩下兩輛卡車，到國民黨向貴州潰退時，這兩輛卡車也沒有了，倪家璽和成千成萬的難民一起徒步逃難，他唯一的女兒就在逃難的路上死去了。

抗戰勝利後，倪家璽回到上海。老家的資本大大充實了他，

他迅速把攤子鋪了開來，先後成立了炎華實業社、楊清長途汽車運輸公司等企業，重建了留蘭香化學製品廠。也在这時，倪家璽同其他一些資本家合股，把英商義利洋行買下來，更名為義利食品廠。

義利洋行是當時上海著名的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倪家璽等滿以為憑着義利的名聲，可以大賺一筆。不料美貨傾銷，市場上到處是美國巧克力、美國水果糖，義利食品廠的產品銷路很快就一落千丈，到最後每月只能勉強開工十天半月，全廠只剩下一套陳旧的機器和六十多個工人，資金枯竭到連工資都發不出去。

倪家璽經營的其他企業，在美國帝國主義瘋狂的經濟侵略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扼殺下，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厄運。辦企業越來越沒有前途，投機市場却一天比一天活躍起來。倪家璽也把資金從企業里轉到投機市場上來，大做起黃金、美鈔和棉紗生意，整天買空賣空。

上海解放了，投機市場被取締了。倪家璽只得回過頭來經營企業，把主要精力用到義利食品廠來。但是這個廠沿襲舊習，擺着一付專門生產“高級食品”的自命不凡的架子，脫離廣大人民的需要，產品銷路始終不能打開。義利食品廠的原料供應和產品推銷全部是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發生關係的；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活動範圍，在我們的國家里，隨着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斷增長，是越來越小了，不同國營經濟掛鉤，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就越來越困難。同時，在企業內部，勞資糾紛也日益尖銳，工人們不願意受資本家的剝削，看不慣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各種落后的和混亂的現象，生產情緒不高。

這樣，倪家璽的如意算盤又落空了，義利食品廠又陷入發不出工資的困境。但倪家璽還不甘心失敗，他一狠心，把六個門市部都租出去，拿了一筆押金，擴大了流動資金，滿以為流動資金

多了，企業的情況就會好轉。可是，沒有幾個月的時間，流動資金又賠光了，企業奄奄一息，義利食品廠不但沒有讓倪家璽賺錢，反而成了他的包袱。

在無路可走中，義利食品廠接受了國家的投資，變成公私合營企業，並從上海遷到北京來，改名為義利食品公司。

義利食品廠公私合營，對倪家璽說來真是一個福音。他私心竊喜，認為這個包袱总算扔給國家了；再賠錢，該由國家來管。可是，這麼大一筆資金沒有撈回來，竊喜之餘不免又有幾分惋惜。再看到實行公私合營後，資金多了，很想抓着這筆本錢再大幹一場。因此，當公私合營義利食品公司董事會讓他當經理的時候，他打消了最初想乘機離開義利食品廠的念頭，利用公股代表不熟悉業務，不明确怎樣改造企業的弱點，操縱了整個義利食品公司的大權，把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這樣，義利食品公司雖然掛出了“公私合營”的牌子，但對倪家璽說來，他所接受的不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企業中的領導，不是國家對他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僅僅是一筆投資。這筆國家投資在倪家璽看來，同其他私人投資並沒有什麼區別，都一樣是他發展資本主義的本錢。

倪家璽主持的義利食品公司無論在經營上、管理上都繼承了舊義利食品廠的一套腐朽的辦法，結果也和舊義利食品廠一樣月月虧本。特別是倪家璽追求暴利，一斤巧克力糖成本只三元多，却標價八元，更閉塞了銷路。公股代表屢次督促倪家璽改變經營方針，薄利多銷、面向大眾，但倪家璽仍然獨斷獨行，對公股代表的建議不理。這樣，義利食品公司又陷入困境。到1952年年初，全部流動資金賠光不算，還負債75,000元。這時候，“五反”運動開始了，75,000元的負債震驚了義利食品公司的全體職工，大家被倪家璽拒絕接受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領導，終致

把企業搞垮的罪行激怒起來，同時，老工人們又揭露了倪家璽在合營時高估財產，拉攏工人的非法行為。在工人群眾強大的威力面前，倪家璽不得不低頭認罪。

到這時候，倪家璽才逐漸認識到社會已經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已經走不通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社會主義力量改造着資本主義制度，他站在和這力量對抗的地位，就不能不失敗。

“五反”運動之後，義利食品公司的面貌煥然一新。

在“五反”運動中，義利食品公司同時完成了企業的民主改革，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同時，在倪家璽停職反省期間，以公股代表為首組成的臨時行政小組通過了決議，改變營業方針，降低價格，薄利多銷，面向大眾，並逐漸縮小了同自由市場的經濟聯繫，為百貨公司、合作社和機關團體加工訂貨的業務量大大增加。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企業中樹立了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

當“五反”運動結束，倪家璽回到義利食品公司擔任副經理時，這個企業已經從月月虧損走向月月有盈餘了。糖果的日產量從三百斤提高到六、七百斤，餅乾的日產量從九百斤提高到一千多公斤。

企業穩定下來，有了前途。倪家璽的生活也穩定下來，也有了前途。——這個前途，就是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放棄剝削，變成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一個光明的前途。

在這個前途的面前，倪家璽猶豫了一陣，一度表現消極。但是，永遠消極下去是不行的。路只是兩條，不走那條，就走這條。倪家璽是企業中的一分子，企業在改造，他在這個企業里工作，同公股代表坐在一幢房子里，天天和工人見面，也不得不改造自己。倪家璽的家庭是社會的一個細胞，社會在進步，他的家庭也在進步，他的四個兒子有的是共產黨員，有的參加了部隊，他們

督促着他進步。倪家璽是一個識時務的聰明人，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既然走不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確實還有前途，也就跨上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大路。

跨上了這條大路之後，倪家璽才發現這條路比自己最初設想的要寬廣得多。公股代表幫助他，教育他，尊重他的職權，糾正他的錯誤，鼓勵他進步，工人們也主動改善同他的關係，他覺得自己在企業中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他的一切正確的意見都能在企業里被採納。在開展增產節約競賽的時候，他創造了一種裝四兩糖的紙袋，僅就當時為北京市百貨公司加工的一批業務計算，就可以節省二萬多元。他建議把果子麵包的包裝紙改六開為八開，建議摻硬臘油燙臘紙，不僅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質量。這些好的建議都受到了職工們的歡迎。

義利食品公司日益發展起來，成為北京市公私合營企業中一個成功的先例，在北京市工商界中有一定的影響。倪家璽也先後被選為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北京市糖果行業公會的主任委員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之後，倪家璽一面籌劃着在義利食品公司推行定息的辦法，一面奔走於同業之間，計劃着北京市糖果業的全行業合營。

倪家璽對自己的前途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充滿信心。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前途同社會的前途結合起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1956年1月12日)

訪上海資本家榮毅仁

新華社記者 徐 中 尼

在上海市私營工商業全部申請公私合營的前夕，記者訪問了申新棉紡織印染廠總管理處總經理榮毅仁。

榮毅仁的住宅很幽靜，住宅的客廳陳設雅致，透過乳白的紗窗簾，可以看到一片花木修剪得很整齊的園地。靠窗斜擺着一架他的女兒們所喜愛的鋼琴。當記者去訪問的時候，榮毅仁在外面開會還沒有回來，他的夫人正在準備帶第三個女兒去少年宮，那里，少先隊員有一個集會，邀請她去講話。兩個在高中學習的大女兒，明天要期終考試了。一個在初中念書的兒子剛剛結束考試，歡躍地走進來，迎着他媽媽說他們的學校就要由私立改為市立了。

不久，榮毅仁匆匆忙忙地趕回來了。這位在中國八個主要城市里擁有24個紡織、印染、面粉和機械工廠的榮氏家族的代表，今年40歲了。作為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的副主任委員，他一個多星期以來就為公私合營的工作而忙碌着，經常忙到很晚才回家。

當記者向他提出“作為一個資本家，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時候，他說：“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我想應該先從作為一個中國人談起。”

“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動了。我的愛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屬代表會議，她參加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已經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會議，他還要去北京參加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我的三個在中學念書的孩子出席

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們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講了話，拥护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不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產主义。

“这是真心还是假話？到上海來訪問的不少資本主义國家的朋友們对这个問題特別感到詫异。他們曾來找我、問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講講‘真心話’，一位英國的議員要我直接用英語談話，有的來看看我還有沒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產黨員假冒的資本家。我坦白地告訴他們，解放前我不但沒有接觸过共產黨，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業，听到了我談的經歷和体会，他臨走时握着我的手說：‘現在，我帶到中國來的疑問可以說是解决了’。”

榮毅仁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柔軟的沙發里，开始了过去的回憶。

他說：“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大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帝國主义稍稍放松对中國的侵略的时候發展起來的。我的父親和伯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創辦和發展了自己的企業。这些年代，全國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國主义的愛國运动。我父親一輩人，夢想着办工業，救國圖強。当战争結束以后，帝國主义卷土重來，日本加緊了对中國的侵略，加上連年内战和外國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影响，我們的企業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父親一輩曾經把希望寄托給北伐以后的國民黨政府，可是蔣介石上台后對我們的第一手，却是無端通緝了我的伯父榮宗敬，敲詐了10万銀元。1934年，当申新最困难的时候，我父親以价值三、四千万元的財產抵押給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簽訂借款500万元的合同。当时官僚資本的头子宋子文想乘机挤垮申新，吃掉我們的企業；当銀行只付了280万元时，他就強制停止繼續付款。直到抗战勝利以后，蔣介石的淞滬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70歲的父親榮德生綁去四十多天，勒索了二十多万美元的贖金，还给所謂‘破

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了更多的酬劳。”

荣毅仁接着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马路上，美国兵横冲直撞，北京的女学生被强奸。我父亲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就是我的爱人，虽然当时所想的只是如何过安乐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容忍外国兵对自己同胞姊妹的污辱吗？那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而蒋介石国民党只会给祖国带来更多的屈辱。”

荣毅仁问道：“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國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

他接着说：“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下来。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中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40%以上，从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达到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重要的还在于解放以后六年來，國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

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結果，棉花產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我們的紗厂不再依靠外國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勝利，打破了我們曾經有过的对帝国主义的畏懼。接着，五年計劃开始了，全國兴建了許多大工厂，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一切實現得比夢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沒有共產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哪能有今天！”

这时，記者插断了荣毅仁兴奋的談話，要求他談談对社会主义的認識。

荣毅仁接着說：“我受了六年的社会主义教育。1952年我到了莫斯科，还訪問了苏联其他几个城市。我親眼看到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但不比我國一般資本家差，而且还要好得多。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人，生活过得比我还好。單从个人物質生活來看，社会主义對我們中國的資本家來說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还值得羡慕。再从生產上看，我們还用不着拿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濟跟資本主义时期的盲目投机和互相傾軋來比較，只从工厂取消了对工人的搜身制一件事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取消搜身制以后，工人的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几年來就極少有工人帶东西出厂的事情發生。企業納入國家資本主义，特别是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工人劳动热情大大提高，自觉地遵守劳动紀律。过去用罰、用开除的压迫手段做不到的事，改革了資本主义的旧制度就办到了。僅僅从这些方面，我就認識到資本主义的剝削关系非消滅不可。”

記者進一步直率地問：消滅剝削，廢除資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思索了一会，很快就答道：“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投資总額是多

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荣毅仁在将要结束自己的谈话的时候说道：“消灭剥削，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他指着坐在一起的孩子們笑着說：“他們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他們的前途，用不到我拿金錢去買。誰都認識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國才能够强盛繁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替我們安排了出路，经过一个公私合营的过程，培养和锻炼我們的技術和業務能力，支持我們有利于國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得到很好的照顧。只要自己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当記者問到他現在的生活和將來的打算时，他笑着說：“几年來我从企業得到的利潤收入，如果要我自己花掉，我实在沒有办法花哩。我的企業已經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潤更有了保證。我已經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潤以投資企業和購買公債的方式，用來支援國家的建設。我个人願意在任何工作崗位上來尽我的責任，做一个对國家、对社会主义有貢獻的人。”

在記者告辞以前，荣毅仁的全家人又圍坐在一起，他把記者的談話記錄念了几段給他的夫人和孩子們听。

(1956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我一定要趕上新社會

——訪問私營中英貿易行經理劉樹墉

“天津日報”記者

私營中英貿易行在 1955 年年底被政府批准公私合營，記者昨天特地訪問了這個貿易行的經理劉樹墉。

這個成立於 1935 年的貿易行，到今年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在經營進出口業務的二十多年中，這個貿易行經歷了無數次的風險，幾度瀕於倒閉，只是在解放後才穩定下來。經過解放後六年多接受改造的實踐，這個貿易行的經理劉樹墉、副理張瑞庭、襄理楊蔭濃三個人，已逐步認識到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私營工商業者唯一的光明大道。在進出口業被批准全行業公私合營後，他們很快就決定把歷年從企業中分得的紅利 10 萬元，拿出來投入合營企業。

“我們不能空說主動爭取改造呀！必須拿出實際行動來。”劉樹墉和記者談話的時候，心境顯得很愉快。他向記者介紹了中英貿易行的歷史，說明了他怎樣認清了自己的前途。他說：“過去我們的命運掌握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家手里。在七七事變前，我們為了要保住資金，曾經把偽法幣 10 萬元撥到上海存起來，可是後來‘毛’得沒有剩下多少錢。存錢不行，我們就存貨。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我們存在倉庫里的一批大五金又被日寇封了，經過不知多少次交涉，最後還是被他們用‘官價’買走了。說是買，實際上和搶走了一樣。這樣一來，我們貿易行的資金就去了一半。日寇投降後，國民黨來了，我們原以為日子要好過了，誰知買賣大部分又都被官僚資本家占去了，加上物價一日三變，

那时候，我們沒有一天不是在惶惶不安中过日子，手中連現款也不收存，有多少錢都買了黃金，有開銷時就賣几兩应付应付。要不是解放，我們这个買賣很快就要垮台的。

“解放后，不但我們这个貿易行的營業慢慢穩定下來了，1953年我們还又开办了一个螺絲釘工厂。1955年9月，这个工厂首先被政府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時間虽然不長，但是已經使我們体会到很多道理。最近經過學習，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解放以前，自己虽然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办不到。”

“再說，”刘樹墉沉思了一会兒，又接着說下去，“这筆錢存在我們手里也沒有用处。我和我的妻子都有工作，我們的收入完全够生活的开支。我有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在工作，他們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生活，根本不要我的錢，四个在上大学，一个在上中学，他們也花不了我多少錢。我的一个兒子、一个女兒已經参加了中國共產党，兩個女兒、一个兒子已經参加了青年团。他們在党和团的教育下，已經成为或者就要成为國家有用的人才。他們都經常鼓励我要主动爭取改造。螺絲釘工厂1955年被批准公私合营后，我馬上寫信告訴他們，他們都說我做得对，而且还都要我繼續積極接受改造。

“在这种情形下，我留着这筆錢做什么呢！所以1955年我就有意把自己手里存的錢拿出來。今年新年一过，我和張瑞庭、楊蔭濃一商量，馬上就决定了。”

刘樹墉越說越兴奋，他的兩眼發出亮光，身上好像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

“再过几天，我們合营公司就要正式挂牌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他忽然把自己的声音压低了，“我大半輩子是在旧社会里过的，很多宝贵的時間过去都用在了許多無聊的事情上，今后我

可要好好工作。有个朋友看我今年已經 61 歲了，曾經劝我退休。我可不这样想。我是甲午中日战争那年生人，許多叫人痛心的事情都經過了。我也到过美國，曾經在那里親身受过許多侮辱。現在我們的祖國强大起來了，我真是覺得自己越來越年輕了。我身体还很好，在業務上多少也还有点經驗，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拿出來，好好地幹一番。”

“当然，”記者和刘樹藩告別时，他又意味深長地說：“我自己的思想和新社会还有距离，但是我一定要赶上新社会，不管有什么困难。”

(1956年1月9日)

找到了光明的道路

公私合营上海机器厂厂长 顏 耀 秋

1930年和几个朋友集資办了上海机器厂。我厂当时生產的四馬力柴油机，配合六吋口徑离心水泵，每天能灌溉 30—50 畝田地，照理能够適合農村的需要。但是由于農民受地主的嚴重压迫，由于开厂以后第二年又適逢江南、江北大旱，農村根本沒錢買机器；开厂第三年又遭遇到“一·二八”事变，工厂便被迫停工。其后四年，慘澹經營，元氣稍告恢复，但是日寇侵占了上海，工厂被迫迁到重慶，借錢造成了厂房。落成不久，最好的一个工場又被敌机炸毀。

抗日战争勝利后，反动政府感到海口通了，美國帝國主义物資可以源源运來，就下令廢止同我們訂立的定貨合同。工厂是靠生產來維持的，廢止定貨合同，就等于強逼关厂。各厂負責人

集合向当时的反动政府战时生产局要求履行合同，又向伪行政院院长官僚资本头子朱子文请愿，结果反被他侮辱了一顿。反动政府就是以这样欺诈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民族工业者。结果弄得所有迁入内地的工厂只好廉价机器和原料来遣散职工回乡，我所经营的企业几乎崩溃。

我只身回到上海以后，谁知留在上海的机器和原料早被日寇掠夺一空，厂房已经变为棧房，并且被反动政府接管查封。我费尽心机，利用我们内迁支持抗日战争的名义，联合了22个内迁工厂的负责人，分头向反动政府请求，允许优惠承购敌伪工厂，并且不惜利用当时所谓“有力人士”和“流氓头子”去说项。结果总算给我们钻到伪币贬值的空子，分四期付款，把敌伪工厂买下来。这时，又遭到官僚资本和美国帝国主义剩余物资大量倾销的压迫，加上通货膨胀，弄得天天靠借债度日，走投无路。我曾想仰仗几个较大的厂把工厂维持下来。这几个较大的资本家则利用我处境的困难和好名的弱点，确定我担任总经理，专门对外，并且给我较高的月薪；厂内生产由他们负责。但是，他们接收了工厂以后，就赖账了。新经理下厂时带了六个亲信，佩带手枪，借去厂内生铁60吨，遣散全部职工，我也失了业。

解放以后，这些大资本家一看情况不对，才把工厂还给我。在职工同志们们的支持下，1949年9月16日工厂正式复工，并且蒙人民政府给予大量定货和各种扶植，企业元气逐渐恢复。但是，我仍用老一套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致业务虽忙，企业仍是每年亏损，资金周转仍有困难。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早日得到公私合营，依靠政府来替我克服困难。其实，我对于公私合营仍有许多顾虑。后来，听了党的负责人和政府首长的报告，阅读了有关文件，才逐步认识企业中必须有社会主义成分在内，才能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认识只有进一步接受改

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加上职工同志們的推动和督促,并且征得股东的同意,我在1953年11月正式申請企業公私合营。1954年元旦正式实行公私合营。合营以后,在公股代表領導之下,改革了各項制度,职工生產热情不断提高,职工人数也大大增加。回想当年我厂初开办的时候,打着“实業救國、改進農村生產”的牌子,所生產的水泵,每部每天只能灌溉30—50畝田,而且農村無錢購買。今天我厂出產的柴油机已經做到150馬力,水泵口徑已經做到五十多吋。公私合营前二十多年沒發过股息紅利,公私合营后的第一年,股东就分到了利息。如果不是党和政府的領導,哪有今天的成果;不是职工同志們的支持、督促和努力,哪有今天的成績!

現在,全市工商業都已經实行了公私合营。这只是我們掌握自己命运的开端。要徹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須進一步自我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們有决心和信心为达到这一点而奋斗。

(195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感 触 最 深 的 几 件 事

——信誼制藥厂总經理談合营后的体会

新華社記者 徐 中 尼

“我所經營的信誼制藥厂,在私营时期,是中國私营制藥厂中最大的一家,有三十年的歷史。制藥工業原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企業,但这只有在公私合营以后,才做得到。”

上海公私合营信誼制藥厂总經理陈銘珊,对記者的談話是

这样开始的。他在这个企业里先后担任副经理、经理和总经理的职务已经有十五年了。他最近当选为出席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上海市代表。

记者希望他谈几件感触最深的事。他说：“我们的企业从1954年7月1日实行公私合营以来，在日常的业务活动中，处处使我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感触是很多的。”

40万瓶“伤心货”

“就从合营的那天谈起吧。那天，我陪公股代表一起下车间同工人们见面，工人们热烈地欢迎公股代表。到了包装车间，那里的工人不是在包装药品，而是在拆掉药品的包装；他们对公股代表苦笑着说：‘我们在拆伤心货’。原来，从1953年到合营以前，大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近40万瓶青霉素片，因为水份超过规定，全部从各地退回来了，价值30万元的药品全部损失了。

“这主要是我们看到青霉素片销路好，盲目增产不顾质量的结果。这样大的损失，我也很伤心；但当时还只看作是企业的一笔损失，没有意识到同时是国家财富的一项不小的损失。

“当时公股代表对工人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伤心货了！’车间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鼓掌声。

“果然，公股代表到厂后，就发动群众和技术人员，摸到了质量不好的关键、改进了包装车间的湿度，改进了操作方法，还改进了处方。从此以后，我们厂里生产的几百万瓶青霉素片，再也没有一瓶退货，含水量都控制在0.5%以下，超过了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是不超过1%）。”

记者在这里插问了一句：“公股代表是不是国营制药厂调来的有经验的业务干部？”

“不，使我感触最深的正在这里。其中一个中共上海市黄

浦区委员会的党的工作人员，一个是从人民银行调来的，原来并不懂得工厂管理和制药业务。但他们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法宝是依靠群众，深入调查，随时从各方面了解情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得到正确的结论，一声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问题就解决了。这在私有制的企业里资本家是作不到的。

“从这一批‘伤心货’，我第一次在企业内部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美國運來的失效藥

“公股代表特別注意藥品的質量，不但不合格的藥品不許出廠，而且每一粒藥、每一支針都要求做到甲級品。現在每一種產品要經過四道關口檢驗，最後一道關是把樣品存在廠里過一定時期再檢驗，如果發現品質有了變化，立刻把外面還沒有用的這種藥品全部收回來。這種對待人民健康的高度負責態度，使我更加深刻地感触到私營時期所做過的那些十分可恥的事情……

“記得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美國藥品大量傾銷，上海制藥的工廠倒掉了一半，我們的化工廠也停工了，藥廠的產品銷不出去，只好改做進口生意。當時美國一家商行來電報說，有青霉素片 12 萬瓶，價錢便宜，招牌要我們自己貼。我們一算利潤還不錯，就匯了 11 萬元美金，訂好合同四個月交貨。不料過了六、七個月貨還不來，等到這批貨催到上海，官僚資本孚中公司、楊子公司批來的貨早已充滿了市場，市價大跌，我們只好跌進成本出賣，賠累了七萬多元美金。

“事情還不止這一些。當這批藥賣出了大部分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兩個瓶子原來的招牌沒有刮掉，一看，這批美國貨早已過期失效了。這樣大的一筆數目退回來如何賠得起？向美國商行

办交涉是办不了的。我就不許大家声張，親手把這兩瓶藥片拿來毀掉了。12万瓶失效的美國青霉素片就这样全部賣出去了。吃了帝國主义的虧不敢声張，而竟然不惜牺牲成千上万的人的身体健康來保留自己这一点資本，这就是資本主义制度的本質，回想起來，对照今天，多么的殘酷！多么的可耻！”

怀孕的女工

陈銘珊接着又談到一件感触很深的事：“有一天，我和公股代表一起坐車到厂里去，他对我說：‘陈先生，你看大卡車顛簸得厉害不厉害？’我問他什么意思，他說他看到厂里許多做母親的和怀孕的女工，在雨天雪天里來去不方便，正考慮是否可用卡車接送。这几句話，真像一股电流一样穿过了我的心臟。我們厂里过去有一条厂規：不雇用結过婚的女工，女工一結婚就立刻解雇。曾經有一个女工背地里結了婚又有了孩子，为了怕失業，她使勁的把肚子扎緊，不讓別人看出來。結果生下来的孩子，手和脚都歪曲了，成了畸形的殘廢人。这种駭人听聞的厂規，在我們厂里曾經实行了十五、六年之久，不知伤害了多少母親和孩子的生命和健康！而今天，公股代表不僅考慮用車子接送，还在考慮車子的顛簸会不会震坏沒有出世的孩子，使我真正看到了偉大的階級友爱和动人的感情。我开始認識到我們兩人之間有着多大的区别啊！”

當我們談話的时候，俱乐部背后不时地傳出了唧唧呀呀的孩子声音。陈銘珊告訴記者，这是合营以后新設的托兒所和哺乳室。現在，做母親的和孩子們上下楼都是用电梯送的。

到車間里去

記者請陈銘珊談談企業合营后个人在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

学到了什么？

陈銘珊結束了沉重的回憶，以后的談話是愉快而兴奋的。

他說：“合营以后，我的工作开始的时候是有些縮手縮脚的。有一次，我同厂內各科、室的人员正在討論解热止痛片的生產定額，当时的紀錄，每人每天最多包裝八百包。討論的时候有人建議把定額提高到一千二，大家猶豫不决，怕达不到。正好公股代表進來，他笑着說：‘你們不要在这里討論，下去同工人商量商量吧。’我們到車間里同工人一商量，工人說提高到一千四也沒有問題。实际上經公股代表和工会一动员，每人一天最高可以包裝二千二，最近社会主义競賽一展开，已經到了二千八。

“从此，我学会了到車間里去同工人商量的工作方法，經常下車間。合营前，我有时也到車間去，但不知道下去做什么？生產关系沒有改变，工人对我看法兩样，我蹣跚一趨就跑上來了。現在职工們对我接近了，还經常主动找我談問題。工作也就大胆多了。”

無私的援助

“还有一件事，是我受了社会主义教育以后的進步，就是开始把國家的利益放在前面考慮問題了。

“1955年，人民代表視察工作，我参加的小組視察國營上海第三制藥厂。厂長彙報說，他們厂里積压了一百多万瓶青霉素，因为粉子太粗，做了針藥在打針的时候會發生抽不進、打不出的現象，因此不能出厂。青霉素擱久了就要失效，看到厂長为这許多國家財產而着急的心情，我想起从前在青霉素上吃过美國商行的虧，也看到我國自己生產的雪白的青霉素的結晶，很兴奋。可是粒子太粗，怎么办？我能不能出一点力呢？这时我想到自己厂里有一部磨粉机，能自动控制溫度，可以把粉子打細到五微米

以下，而这种磨粉机上海只有一部。我就决定借给他们。我们自己的磨粉工作，由职工们想办法用别的方法代替。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刊载了这个厂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的消息，所生产的青霉素的質量粗细都符合标准。这粗细两个字，旁人也許不很注意，我看了却感到说不出的光荣。事情虽小，但在过去，我会这样做么？”

陈銘珊在結束他的談話的时候，声調是那样的兴奋。他說：“这，正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改变私有观念，放弃剝削，做一个对社会主义社会有贡献的光荣的劳动者。企业合营以后，党的領導，公股代表的帮助，职工群众的团结和支持，给了我最好的条件。国家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短期內消滅各种病虫害的偉大规划已經提出來了。我們的厂已經接到了生产大批治療血吸虫病的針藥的任务，这个月就要投入生产，我知道这是光荣的任务，我还年輕，党和人民引導我走上了寬闊的光明的道路。”

(1956年2月3日新華社新聞稿)

社会主义是最可靠的“保險”

——訪公私合营崇信紗厂副厂長沈祖械

陸 泉 源

公私合营崇信紗厂副厂長(私方)沈祖械，18日在上海市工商界青年代表會議上發言說：“現在我決定把我歷年來積蓄的人民幣二萬元以及先母遺留給我的黃金224兩，全部拿出來購買1956年公債，支援國家經濟建設，作为向大会的獻礼。这224兩黃金是我母親給我的。她在世的时候，看到在当时旧社会里工

商業者隨時隨刻有破產的可能，她對我說：‘生意人的錢一蓬烟’，她很不放心，特為留給我這筆‘保險金’，以防萬一經營失敗，還可以靠這筆‘保險金’來維持生活。現在毛主席指示我們，只要認清社會發展規律，工商業者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我現在再也不需要這些黃金來保險了。因為社會主義就是我們今後幸福生活最可靠的保證。我已經加入了工商界青年突擊隊，為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盡我一分力量。今後一定要加強學習，鑽研業務，積極地接受改造，放棄剝削，熱愛勞動，爭取早日成為一個光榮的勞動者。”

他的發言說出了很多工商界青年想說的話，所以他的發言雖然很短，却一再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

沈祖棫先生從小生長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里，他的父親開設了沈元來桐油號。他從小過着資產階級“少爺”的生活，1944年在南通紡織工學院畢業以後，就回到自己店里做“小開”，不到三年，他就當了經理，代替他父親做了老板。從那時開始，他就走上了剝削階級的道路。

記者訪問了沈祖棫先生。他一開始就說他媽媽的話也是對的：在解放前，工商業者確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他說，他的“沈元來桐油號”雖然依靠吃“蝦米”而發展起來，但是自己呢，也有被吃掉的危險。他舉了一個例子說，1947年，桐油出口要照反動政府規定的外匯牌價結匯，而官僚資本張禹九的植物油料廠却在華南大量走私出口，套取外匯，並且勾結帝國主義商人，拚命壓低價格傾銷，壟斷市場，害得他在國外寄賣的桐油，一下子虧脫了50萬美金，幾乎造成破產。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我母親才給我留下了這一筆‘保險金’，以防萬一。”他又笑着說，他媽媽要是活到現在的話，也要改變她的這種看法的。

接着，沈祖棫先生就談他在解放後進步的經過。他談了

面几件事情：“我有一个弟弟名叫沈温樾，他本来也和我一样，从小过着资产阶级生活，‘少爷’脾气十足。可是解放后，他在学校里受到了教育，却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加入了青年团，大学毕业后又当了助教。使我感到最震动的是，当他一开始工作以后，就拒绝了家庭给他寄去的钱，他真正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的前途使我感到羡慕，也使我感到自己过剥削阶级生活的可耻。

“我的妻子，也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五反’运动后，她也不愿过‘少奶奶’的生活了，立志要去工作。她在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文师资训练班里积极地学习俄文，去年终于分配到国家机关里去工作，也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这件事给我的震动也很大。

“这些家庭里的变化，怎么能不使我发生震动呢？我想，我也是个青年，今年才不过33岁，我也读过纺织，懂得一点纺织的知识，我也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去年沈元来桐油号转业的时候，我就要求政府把我店资金全部投入纺织工业，我并要求到纺织厂去工作。政府果然同意了，我们的资金投入了公私合营崇信纱厂。政府也很照顾我，派我到崇信纱厂去当副厂长，正符合我的志愿。

“可是，我还是以资方的身分去当副厂长的，老实说，当时我还是有顾虑的，担心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我是否能得到安排，所以我还是保留了我母亲留给我的‘保险金’，没有投入企业。

“一直到进了公私合营崇信纱厂以后，在公方厂长帮助下，我对党的政策更加有了正确的认识，工作也很愉快，在工作中我和大家一样，这使我相信我也能成为光荣的劳动者。这次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时，毛主席要我们资本家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

对我自己的前途不再担心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人生活都有保障，而且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没有必要再留这一笔‘保险金’了，决心把这 224 兩黄金拿出来购买公债，表示我对社会主义的衷心拥护。”

(1956年1月24日“解放日报”)

一个双目失明的资本家当了副厂长

“大公报”记者 覃于越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合营之前，橡胶业里有些资本家在议论：

“看政府把‘新中国’的那位瞎经理怎么合理安排？”

“新中国”，是指的私营新中国橡胶厂；“瞎经理”，是这个厂的资方人员张益吾。

北京解放不久，张益吾就和几个朋友开办了新中国橡胶厂；1952年下半年，张益吾得了网膜炎，两眼都瞎了。几年来，他靠着两只耳朵一张嘴，管理着这个三十来人的工厂，他是有一定才能的，业务搞得挺不错。1954年，厂里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以后，张益吾在党和工会的领导协助下，把再生胶的产量提高了50%，成本减低了15%，因此得到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奖励。1955年又得到市百货公司的奖金。每当谈到这些成绩的时候，张益吾总带着些自豪的感情说：“靠工人阶级的领导，咱厂总算没落后！”

但是，这是在过去；现在，公私合营的大浪掀起来了，工厂要合营了，瞎了两只眼的张益吾还能继续管理日益扩大的企业吗？

政府还能要这样一个瞎子工作嗎？

同業怀疑，張益吾担心，連他的回教教親也替他發愁：“阿匄（張在办厂前担任过阿匄）以后还能作什么呢？”

这大半年來，每当別人給他讀报，或者收音机里傳來公私合营的消息的时候，張益吾听在耳里，煩在心里，“怎么办呢？六年多來，我都在这兒工作，可是合营以后，如果政府不要我了，我就要离开工厂，叫我怎么受得了？”

有一天，一个朋友來看他，不由得就談到工厂，談到眼睛，朋友嘆气說：“真可惜呀，你不殘廢多好！”

送走朋友之后，張益吾心里疼了一夜。作为一个工業資本家，他格外知道“殘廢”的意思：“殘”，还好，次貨膠底，还能賤賣；“廢”呢，那就是五分錢一斤的廢料，唯一的前途，是回爐作再生膠。張益吾打心里往外冷：我是不是归到“廢”里啦？

半夜里，他双手在那黑洞洞的眼前抓摸，他多么渴望把那对瞎眼抓出來，換上一对好眼！

可是，沒过几天，張益吾从他心爱的收音机里听到彭真市長关于改造私营工商業的报告，張益吾自己說，这个报告真是“撥云見日，豁然开朗！”，他明白共產党是一定要把資本家拉上來走社会主义大道，工厂一定要合营的。那么，自己难道拖住工厂，作大家的絆脚石嗎？何況彭市長說过，对資本家也要量才錄用，合理安排呢？——張益吾心里定了一些。

1月4日，北京市橡膠工業公司召集橡膠業开会，批准17家橡膠厂合营。張益吾也参加了，他跟着大伙一塊鼓掌，一塊高兴。忽然他听見有人嘀咕，說有兩個同業坐在角落里，連口罩也沒摘，既不鼓掌，也不發言；他摸索着站起來，冲着那个角落說：

“剛才公司領導宣布17家厂子合营了，这是大喜事，我們应当繼續爭取合营，不应当自暴自弃。我虽然双目失明，还没有顧

慮。同業中也有年老能力差的，但是總比我強，大家都應該打破顧慮，爭取合營。”他的話使大伙兒很感動，在會場上很起了點作用。

儘管說，張益吾對未來的道路是越“看”越清楚了，但是每當夜深人靜，想到自己一雙失明的眼睛的時候，心里不能不上下翻騰：“合營之後，生活自然不愁，彭市長說過了，年小年老一概包下來；可是彭市長又怎麼知道還有我這麼一個瞎子呢？還會不會分配工作給我這個瞎子做呢？我才47歲呀，我還有工作能力，我要工作呀！”

張益吾就是帶着這樣一顆不安的心，卷進了高潮，迎接了全行業合營。

1月19日，北京市橡膠公司召集各橡膠廠經理開會，協商生產改組和人事安排問題。當張益吾聽到橡膠公司李秀德副經理提出派他擔任輪胎翻修廠分廠副廠長的時候，他頭腦里嗡了一聲，上身禁不住搖擺起來，他有多少激動、多少歡喜交揉在一起！多少日夜來的苦思焦慮，現在被李副經理的一句話一掃而空了。

當天下午，他在公司召集的合營大會上發言了。臨到他發言的時候，他又半天說不出話來，只是兩隻手在胸前由里往外翻，似乎告訴自己說：“我的心翻了個兒了！”好久好久，才掙出一句話來：“共產黨和毛主席對我們這麼照顧，如果再不拿出良心來，實在沒有理性了！”

兩天之後，我去訪問他。這個滿面紅光的健壯的新任副廠長，不斷地用快樂而宏亮的笑聲回答我的問題，他無限嚮往地談着比他的“新中國”大好多倍的分廠，並不掩飾地嘲笑自己的以前的落后和顧慮，保證自己今後一定接受公方領導和工人監督；最後，談到他的眼睛的時候，他閃動着他那雙看來似乎是完好的

眼球神秘地說：

“我有个奢望，也許我的眼睛能治好。大夫說过，能够养好的。1954年厂里增产節約委员会成立以后，生產上了軌道，我的眼睛輕松多了；合营以后，有公股領導，工作大大省心了，心里踏实，我的眼睛可能有轉机，前途是光明的！”

接着，他幻想地、自言自語地說：“要是我真的复明了，我怕我会不認識这个飛躍前進的首都了呢！”

(1956年2月2日)

一个資產階級家庭的变化

賀 富 明

我來到公私合营藝華乐器厂厂長（私方代表）張煥堯的家里，他的爱人——私立香山慈幼院教員年蔚第一句話就告訴我：“从公私合营到現在一年多，是我們結婚十年來最幸福的日子。”

虽然是星期一的早晨，張煥堯夫妇却都在家里。为了積極参加全行業公私合营的工作，張煥堯已經很多日夜沒有好好休息了，領導上批准他休息一天。年蔚也是因为星期日值班，星期一补了假，她正准备給孩子買文具去。張煥堯的父親却早早的上班去了。繼母剛从菜市場買菜回來。几个孩子都挤在炕上画画兒，六歲的小云又是蹦又是跳地說：“爸爸上班，媽媽上班，爺爺也上班，只有我們在家里玩，爸爸要我好好領着妹妹和小姑小叔們，我最大，要当模范哪！”人們从这个資本家家裏，已經只能看到劳动和劳动后的休息，却很难知道，这个家庭曾經有过多少豪華和墮落，这个家庭的成員又是怎样在党的教育下，走向了

新生。

在“五反”以前，張煥堯曾經用各種投機行為，撈了大批錢，但是這些錢並沒有給他們家庭帶來幸福。他們夫婦都很年輕，而且是經過自由戀愛結的婚。然而，他們都按着資產階級的觀點把婚姻和愛情看成金錢關係。那時候，張煥堯認為：“我給你錢花，你就得服我管。”每天到舞場鬼混，深夜才醉薰薰地回來，還生氣罵人。年蔚就翻他的衣兜，找情書、找照片，自己也大量揮霍。誰也不管家庭，不管孩子，最後，發展到要離婚的地步。

“五反”運動給了这个腐化的資產階級家庭以巨大的震動。張煥堯經營的“藝華商行”被評成了嚴重違法戶，黨和政府給了張煥堯和他的家庭以深刻的教育。年蔚永遠記得“五反”檢查組一個幹部對她講的話：“你還很年輕，又有文化，為什麼要作一個資本家寄生蟲呢？”因此，她不顧婆婆給臉子瞧，不顧丈夫的諷刺，積極靠攏黨，當了香山慈幼院的教師。在這個時期中，張煥堯也接受了“五反”的教訓，開始老老實實地服從黨的領導，把資金由投機的商業活動轉入工業，並且參加了民主建國會，參加了工商聯的工作，積極爭取公私合營。這時候，他也是每天深夜回來，但不是去花天酒地，而是參加民主建國會的組織生活啦，理論學習啦，又是工商聯的政策學習啦。年蔚發覺他每一次學習回來，對待家庭的態度都有改變。張煥堯在年蔚身上，也一天比一天多地發現新的品質和作風。

1955年5月1日，藝華樂器廠正式公私合營了。企業向社會主義過渡，也給張煥堯和他的家庭帶來了社會主義氣氛。在公方代表領導下，他積極參加經營管理，鑽研生產，每天回來都是滿身油泥。他常說：“親身參加勞動以後，才知道創造財富是多麼不容易，一毛錢也覺得分量挺重了。”每月的工資都全數交給家里。回家以後，不光不罵人，還向全家人講述在外邊聽到的

國家大事。年蔚除了工作外，还把家庭安排得有条不紊，不该花的钱都不乱花，孩子们的衣裳都亲手做。因此，三个人的工资足够维持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上一年分红3,100元，除留下100元给孩子交学费外，全部买了公债。两口子的感情就不用提啦，见了面还互相提意见，帮助改正缺点。爷爷、奶奶在他们的影响下，也有显著的进步。

最幸福的还数过去没人管的孩子啦！他们也和新中国所有的孩子一样，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成长。家里经常传播着孩子们的喜报：九岁的小弟弟挂上红领巾啦，八岁的小玉当了班长啦，六岁的小云更是一个非常伶俐的孩子，他不仅会一些轻微的劳动，会照顾弟弟妹妹，还会在钢琴上弹出简单的音节，会画蜡笔画，也会在晚会上朗诵“亲爱的空军叔叔”的诗。

说到这些，张焕堯和年蔚都激动地重复着几句话：“共产党不仅改造了我们的企业，也挽救了我们自己，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幸福。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为了将来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更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11日“北京日报”)

我是怎样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的

年 蔚

我叫年蔚，是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教养员。我的丈夫张焕堯是北京公私合营艺华乐器工厂的厂长。但是，在三年前，我的丈夫还是一个“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我也是个专靠丈夫剥削别人来养活的家庭妇女。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改造成能够

給人民做点事情的新人的。

我丈夫原來經營乐器商店。解放前，買賣并不好。解放后，由于人民文娱生活的开展，生意才一天比一天强。到了1951年，我們就兴旺起來，往往一筆買賣就能賺五、六百塊錢。我見丈夫的錢來得那么容易，也不問問他是怎么弄來的。只觉得日子过得挺快活，想要什么就買什么。我感到这就是“幸福”。我得意忘形地向人誇耀：这是我丈夫賺的錢，我花着最硬气。这时候我除了享受，什么都不想。

有时候，我对丈夫的举动也發生过一点点的怀疑。譬如他常常把一些贵重的乐器拿回家藏起來。我又看見过他把一些破旧的乐器修修补补、弄得和新的一样。我一方面覺得他真聪明，有能耐，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問問他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不耐烦了，对我說：“你就甭管啦，有錢給你花就行了唄。”

在我們剛結婚的时候，我曾对他說：將來你能給我買架鋼琴，就达到我的最高理想了。他当真滿足了我的要求，弄了一台鋼琴放在家里，說是送我的。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啊，可是，沒有多少日子，他忽然对我說：“这台鋼琴不好，把它賣了吧。过几天再給你買台好的。”我心里想：他对乐器是內行，以后再買好的不更好么？我同意了，随后他又叫我用我自己的名字去上稅。我虽然感到奇怪：“为什么叫我去上稅呢？”但也沒說什么，就照着他的話办了。这么搞了兩三回，家里还是沒落下一台鋼琴。

“五反”的前一年，是我丈夫最得意的一年。但是，他的“走运”却給我帶來了不幸。我的“幸福”像肥皂泡似地破滅了。發了財，他变坏了。他每天都要到舞場去，一个晚上就要揮霍三、四十塊錢，鬧到深夜一兩点鐘才醉薰薰地回家。我有时劝他，他高兴时便敷衍我，說这是为了做買賣；煩起來就不定說些什么难听的話。起初还不过是对我發發脾气，慢慢地故意刺激我，最后竟罵

起我來了。

他为什么变了呢？而且变得这样坏？我当时曾怀疑他在外边有了女朋友，也想过要离开他。但是，我們已經有了三个孩子，又想到我自己依附丈夫生活惯了，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离开他我怎么办呢？这样，左思右想，只好把眼泪嚥在肚子里。当时我是这样痛苦，但我却不知道这就是剝削階級腐朽生活的實質，更沒想过这也是資產階級寄生虫的普遍的遭遇。

感謝共產党領導全國人民展开了轟轟烈烈的“五反”运动，挽救了我的丈夫和我自己。經過运动，我才知道我丈夫原來是个嚴重違法戶，偷稅、漏稅、向幹部行賄……他都占全啦。这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怎么發的財。我又恨丈夫，又恨自己。我开始想到自己也是新中國的青年人，却一直过着寄生虫的日子，不但沒給人民做一点事情，还帮助过“五毒”俱全的丈夫幹过許多犯法的勾当。丈夫用損人利己的办法弄錢，我去花，这叫什麼生活？想到这兒，我感到自己真可耻，这才想起自己也还有点文化，为什么不做点工作呢？

我决心找点工作做。但顧慮跟着又來了。像我这样一个嚴重違法的資本家的妻子，即使有工作可做，政府会不会相信我，会不会要我呢？但是，当我表示决心放弃寄生生活，願意为人民做点小事情的时候，政府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幫助。党和政府对每一个改过自新的人都是伸出援助的手的。

不久，我就做了街道上的兒童補習学校的教师。1952年，我正式参加了教育工作，当了香山慈幼院的教养員。

我丈夫呢，經過“五反”运动的嚴重教訓，他等于脫胎換骨重生了一回。他認識到如果再不放弃唯利是圖、危害國家的勾当，自己就要整个毀滅了。他下了决心从此愛國守法，老老实实做人。首先，在生活上端正起來，每天按时上下班，再不出去胡搞

了。我自己也想法子精打細算，改变奢侈作風，开始簡朴地过日子。新的干净的生活冲洗了我們灵魂上的污垢，我們的感情在互相鼓励重新做人的基础上又恢复了。

不久，政府动员一些过剩的商業轉向工業。我丈夫就跟我商量，他想响应号召轉入工業，但又怕一搞工業就要增加工人，他有顧慮。我就鼓励他說：“你有技術，轉工業有条件，就勇敢地搞吧。只要你按政府政策办事，就沒問題。”这样，他就轉向了工業，搞起了藝華乐器工厂。跟着，他又参加了民主建國會。党把他教育得渐渐有了觉悟了。

1953年冬天总路綫公布了。我倆在不同的崗位上参加了学习。心里都很激动。有一天我丈夫对我說：“总路綫有了，咱們的厂子也够条件了，干脆把工厂献給國家吧。”我这时正討厭自己戴着資本家老婆的帽子呢，一听这話馬上贊成，冒冒失失地就把申請書遞上去了。結果政府並沒有批准。又經過了深入的学习，在党和組織不断的教育下，我們才認識到这样做是冒進了，正确的态度應該是实事求是地准备条件，爭取公私合营。

1954年5月，藝華被批准公私合营了。我的丈夫仍旧担任厂長。一年半的时间，公私合营的藝華乐器工厂在國家領導下發展得很快，產品已由六、七种增加到49种，其中好几种是过去國內沒有做过的。

我們夫妇倆都有了光明的前途，我們的家庭里也充滿了愉快的笑声。現在，我們每天分头緊張地工作，只有星期日才在一塊。但这个星期天給予我們的快乐是过去不能想像的。現在，我們倆一切心滿意足，只有一件心事，就是怎样努力改造自己，爭取早些搭上社会主义的列車，成为一个光荣的自食其力的人。

(1956年1月12日“大公报”)

我感到真正的幸福

新華社記者 高 潔

在1956年1月18日上海市一万三千名工商業者家屬的盛大集會上，上海市雷允上國藥號的女股東許兆谷走上了講壇。她用緊張而又有些激動的聲調講述自己放棄剝削生活的決心，還提出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八項保證。

會後，記者訪問了許兆谷。她說：“‘雷允上’是一個相當賺錢的店，照理我該生活得不壞，可是我丈夫因為是小老板出身，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和他結婚十多年，過的簡直是眼淚生活。他對家中生活根本不管，五個孩子等於陌路人，靠了親友幫助，他才勉強答應每月貼補一些生活費。但是，在解放前物價天天漲，生活過得很不安寧，痛苦萬分。”

她聲音有些激動地繼續談下去：

“舊社會的婦女像飄在大海中的一葉小船，隨風飄蕩，就是有钱人家的婦女，也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解放以後，我才根據婚姻法同他離了婚，分得了應得的股份。

“人家都說富貴人家不出三代：第一代吃鹽不吃醋（節儉的意思），第二代穿綢不穿布，第三代穿了長衫沒有褲。我的丈夫就幾乎是上面所說的‘第三代’，祖宗留下了錢反而害得子弟墮落腐化。如果不解放，不僅我沒有翻身的日子，即使我丈夫不是‘第三代’，我的兒子也難保不是‘第三代’。”她接着以興奮的心情談到目前的生活情況，她說：“我的五個兒女現在都長大成人了。我的大女兒已經是共產黨員，在北京清華大學當政治輔導

員，第二、第三個兒子在大學讀書，是青年團員；最小的兩個女兒也上了中學。有了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孩子們的前途我再不用擔心了。”

停了一停，她繼續說：

“想起來很慚愧。‘三反’、‘五反’前，我還不認為剝削可恥，以為工商業者‘將本求利’拿點錢是應該的。我認為我自己生活痛苦只是命不好，我巴望孩子長大成人，就想為他們多積點錢，將來他們讀書、生活都有依靠。解放以後，孩子們漸漸長大了，都成了黨員、團員，他們常常寫信鼓勵我放棄剝削，並且說將來絕不要家中剝削來的一針一縷。我想丈夫有了錢並沒有學好，我的痛苦是資產階級的丑惡生活方式帶來的，現在，孩子們都有了可靠的前途，社會主義就在眼前，每個人都能主動地掌握自己的命運，我還有什麼顧忌呢！有了錢沒有好的社會，孩子也要變壞，不如把錢投入社會主義建設。因此，在1954年，我為了爭取企業早點公私合營，就首先把雷允上國藥號生產‘六神丸’每年歸我所得的一部分利潤約一萬元投入了企業。我自己解放以後學過會計，現在學俄文已經學了兩年多。我一定要學會本領為社會主義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

她最後說：“我現在不再感到自己是不幸的人了，在這樣的社會，我感到自己是真正幸福的。”

(1956年1月25日新華社新聞稿)

